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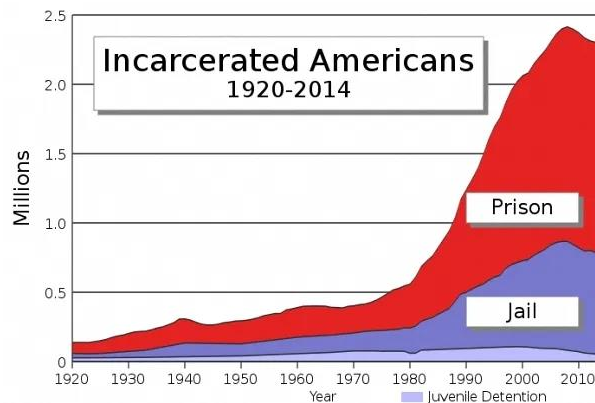
【网络文章】

司法种族主义与警察暴力的政治学

讲座：林垚，整理：张家乐

澎湃思想市场 <https://mp.weixin.qq.com/s/J-tz8Qg1CZUbiHa82oiC6Q>（2020-6-26）

近日，明尼苏达州的黑人因涉嫌使用 20 美元假钞而死于警察暴力执法的事件，在全美各大城市掀起大规模抗议，成为上世纪中叶美国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的回声。《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将推出“黑命攸关”（此处采用豆瓣网友 gonggong 对 BLM 的翻译，特此致谢）专题，从不同视角切入这场声势浩大的黑人运动，并借此梳理二十世纪民权运动的遗产。2020 年 6 月 13 日，在纽约文化沙龙和湾区文化沙龙主办的“种族问题和撕裂的美国社会”线上系列沙龙的第一期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律博士候选人林垚以《司法种族主义、警察暴力与抗议中的暴力》为题，对中文网络中热议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美国司法系统是否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黑人因为高犯罪率而成为警察频繁执法的对象，可以将其归咎于罪有应得吗？黑人犯罪率高是否可以完全归因于黑人整体社区文化？；警察执法暴力是否为个案，示威抗议为什么要针对整个警察体系？美国警察暴力泛滥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抗议的边界在哪里？……澎湃新闻将讲座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最后关于抗议边界的部分因篇幅等原因从略，下文经讲者本人审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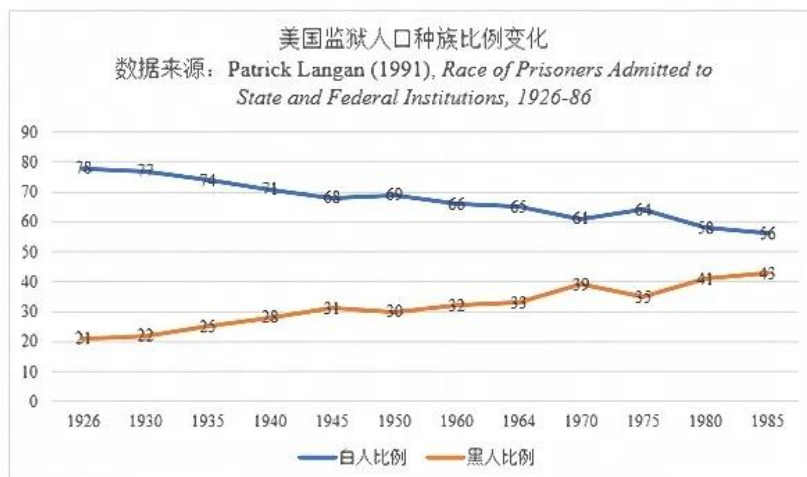


美国每年的监禁总数

黑人是咎由自取吗？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监狱人口，并且为全世界人均监禁率最高的国家。在美国，2018 年，每十万人有 698 人被监禁，囚禁总数近 230 万人（其中有五分之一并未正式定罪，仅因交不起保释金等原因而关押在拘留所中；以下除了特别说明之外，谈及“监狱”时均包括拘留所）。从美国每年的监禁总数一图中可见，八十年代来，监狱人口迅速地增长，目前正在监狱中服刑的人已达 260 万，而 1920 年美国监狱人口仅为 11 万。

在这几十年间，监狱人口种族比例也有巨大的变化，在美国监狱人口种族比例变化一图中，1926 年监狱中白人比例为 78%，黑人比例为 21%，到 1986 年时，二者比例已非常相近，考虑到非裔人口在美国总人口占比 13%，仅看八十年代后监狱人口中非裔高占比，很容易得出“黑人犯罪率高”的结论。但追溯历史数据可以发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监狱种族比例相较正常。（虽然对比非裔总人口占比，其入狱比例依旧偏高，但当时非裔相较现今面临更严峻的歧视问题，在司法系统中非裔更有可能遇到不公正对待而入狱。）可见非裔被大规模囚禁是晚近的现象。



美国监狱人口种族比例变化

如果非裔“天生犯罪率高”、“推崇犯罪”，为何几十年前情况却不是如此？几十年来非裔入狱率、犯罪率的节节攀升又应当作何解释？

黑人社区的衰落

在讨论“大规模囚禁”前，了解几十年间黑人社区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我们需要了解黑人贫民区（Ghetto）是如何被白人利益至上的社会、政治、法律体系所构建，并逐步变为了极度贫困、黑人聚集、集中了阶级与种族矛盾的超级贫民区（Hyperghetto）。

奴隶制终结后，南方得到解放的非裔尽管面临“黑人法典（Black Code）”、种族隔离、吉姆克罗法（Jim Crow laws）等种种刁难与盘剥，仍旧通过努力逐渐积累财富，其中塔尔萨城（Tulsa）原为黑人聚集的城市中最为富裕城市，该城的格林伍德街区（Greenwood District）则是被称为“黑人华尔街”的最富裕黑人街区。1915年，历史修正主义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直接导致第二波三K党运动在全国范围的风行，白人针对黑人的私刑（Lynching）重新猖獗，对于黑人拥有财富的不满使得白人暴民在1921年5月31日袭击了格林伍德的非裔社区居民与企业，并以空袭与地面攻击并行的方式摧毁了超过35个街区，最终将富裕的黑人区夷为了平地。



1921年塔尔萨种族屠杀

因为南方私刑与种族主义的泛滥，南方黑人在1916至1940的第一次大迁徙中迁往纽约、芝加哥、底特律这些正经历大规模工业化、缺乏劳动力的北方城市，以寻求在南方难以获得的社会与经济机会。然而，这一美国内部的非裔迁徙在北方也招致了种族主义者的不满。二十世纪初，出于控制大批意大利、波兰、犹太新移民目的，通过市政法条将新移民限定在特定区域、以维持

本地中上层阶级社区的划区制（Zoning）被用以排斥低收入群体与少数族裔。1908年，洛杉矶通过了第一部全市分区条例，早期法规中有许多明令禁止少数族裔入住社区，虽然1917年明面的种族划区被宣布为违宪，但通过制定复杂严格的排他性划区（Exclusionary zoning）规定（如住户人数限制、住宅楼层数限制、前庭与后院面积要求等），条件优渥的中上层白人社区仍得以将少数族裔排斥在外。

1926年 Village of Euclid, Ohio 诉 Ambler Realty Co. 的标志性案件被最高法院判为合宪后，北方城市也开始通过划区制将黑人排斥在交通便捷、公共设施较好的社区之外。少数族裔开始聚集，形成独自の社区。在这一阶段，黑人社区尚未被等同于贫困区，南方迁徙而来的黑人虽然整体性被排除于白人社区外，但其社区内部亦存在多元阶层，如当时黑人社区内部具有神职人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在行业上也具有多样性。

无论是明面的种族歧视，还是间接的划区排外，二者均使得中上层、具有稳定体面收入的黑人无法融入进条件优渥的白人社区，这反而保证了黑人社区内部完整多样的生态，让黑人社区得以通过内部交流与扶持的方式为同族群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后，一方面表面的种族歧视被禁止，公立学校解除种族隔离，另一方面通过其它市政手段制造实质种族隔离的做法仍旧得到鼓励，大量中产阶级白人迁往市郊地带，同时将有更多资金支持、教育资源更充足的学校带到了市郊（由于美国的公立学校经费主要来自于社区的房产税，缺乏跨社区财政转移支持的贫困社区公立学校往往连日常教学用度都无法维持），黑人内部具有阶层优势的黑人为了让后代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不得不随之迁往远离内城的区域，原来黑人社区内部丰富的多样性因此减少，内层逐渐衰败，变为无业游民与低收入阶层聚集的区域。

另一个恶化黑人社区处境的“红线标记政策”（Redlining）则是联邦政府机构、地方政府、私人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系统性拒绝向特定族裔提供服务的手段。通过将特定区域划入红线，银行、保险业，甚至超市都能拒绝向少数族裔聚集社区提供服务；它们或者通过间接手段配合红线，如为该地区的住民提供服务时要求比其他区域更高的价格来达成目的。在住房问题，尤其住房贷款方面，相较其他族裔，非裔往往面临着更高的首付，这实际是黑人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被掠夺的体现，其直接结果是社会中非裔更易陷入债务负担中。

TABLE 2 The changing class structure of Chicago's South Side, 1950-1980 *

	1950		1980	
	TOTAL	%	TOTAL	%
Proprietors, managers, professional & technical	5,270	3.3	2,225	3.2
Clerical, sales	10,271	6.4	5,169	7.5
Operative, laborers, craftsmen	42,372	26.7	6,301	9.3
Private household and service workers	25,182	15.8	5,203	7.5
Total employed adults	83,095	52.2	18,898	27.5
Adults not employed	75,982	47.8	50,148	72.5
Total adult population	159,077	100	69,046	100

* Comprising the three community areas of Grand Boulevard, Oakland, and Washington Park; adults are persons 15 and over for 1950, 18 and over for 1980.

Source: Chicago Fact Book Consortium, *Local Community Fact Book*, Chicago,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1955, and Chicago Review Press, 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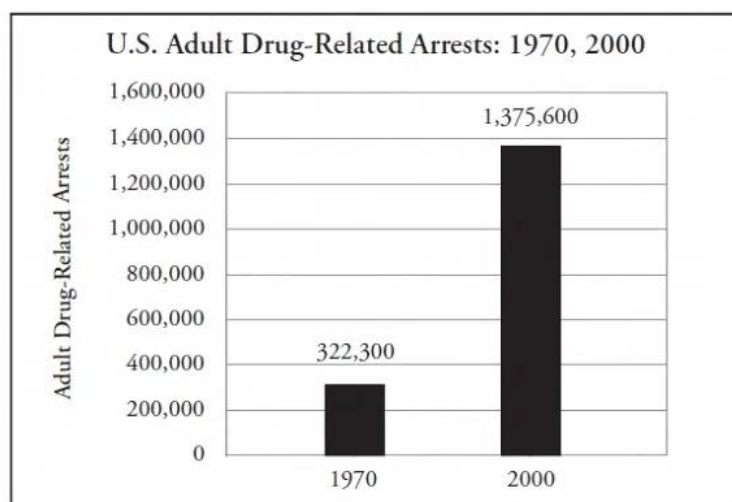
1950-1980年间，redlining与zoning使芝加哥Southside成年就业人口从过半降到27.5%。

综上所述，从二十年代的黑人向北迁徙到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兴起，这一时间段内黑人社区也经历了一个衰败的过程。马丁·路德·金生前也反复提到，光通过投票权法案与民权法案无法改变社会中的系统性歧视问题，也无法改变黑人的社会经济状况。他曾督促约翰逊政府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扶持、就业补助，以打破黑人贫困区域越来越贫困的恶性循环；然而随着他被刺杀身亡，其社会经济层面的呼吁工作也陷入低谷。

但在历史中，为黑人社区加上最后一根稻草的是 70 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囚禁。美国作为总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的 5% 的国家，其监狱人口却占全球监狱人口中却占的 25%，在大规模囚禁中，黑人男性一生中至少被逮捕入狱一次的概率为 33%，而入狱不仅会影响非裔出狱后的求职、租房、贷款等，还会破坏黑人社区的家庭结构、并且将监狱中习得的创伤与忤逆文化等等带回到黑人社区街头。

毒品战争

六十年代后期民权运动带来的保守派反弹，让尼克松得以打着“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的选举口号、通过“南方策略”（Southern strategy）迎合南方白人，而赢得大选。此时，毒品（如海洛因）大规模流入美国市场，美国犯罪率飙升，1971 年，尼克松将毒品滥用称为“第一公敌”，他与后来的里根总统都曾以毒品战争的名义实行严刑峻法。1970 年美国成人因为持有毒品、吸毒、贩卖毒品等而被逮捕的数量为 32.23 万人，到 2000 年已经有 137.56 万人，在这一过程中，非裔的遭受的歧视与不公平待遇借由毒品战争被放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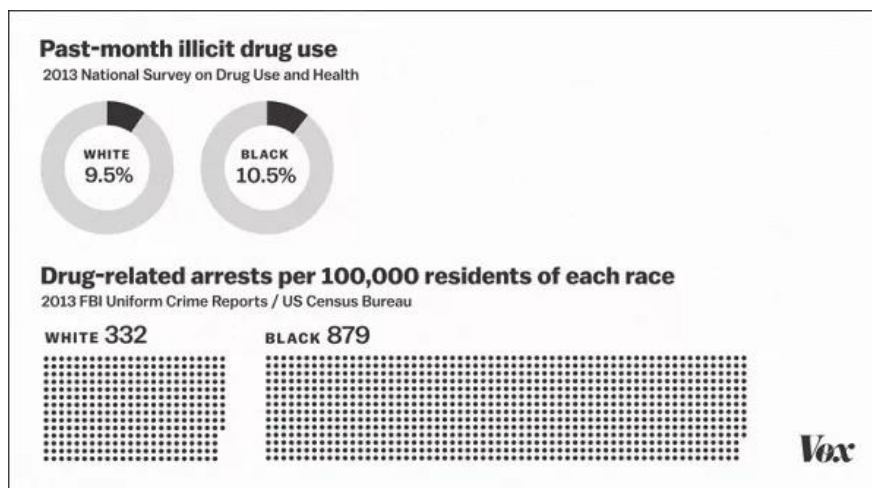


SOURCE: "Drugs and Crime Fact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Report. NCJ 165148, pp. 61-62.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Washington, D.C., <http://bjs.ojp.usdoj.gov/content/pub/pdf/dcf.pdf>.

1970、2000 年美国成人毒品相关逮捕数据

在强制最低刑期（Mandatory Minimum Sentence）等方面，均可见法律系统对非裔的隐形歧视。强制最低刑期指的是为某些罪行设定刑期底线，即使法官认为应从轻量刑，也不得不至少将被告判决入狱若干年以上。七十年代前，毒品问题在美国主要被视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非刑事问题。从尼克松开始，毒品问题开始被视为刑事问题，吸毒者与贩卖毒品者面临着法律的制裁，但由于当时“毒品为公共卫生问题”观念的延续，毒品相关案件的具体判决中相对疏松。宽松的判决引起了共和党议员的不满，后者促成了强制最低刑期的诞生，而对强制最低刑期的设置本身就体现出针对非裔的不公。比如按照 1986 年的反毒品滥用法（Anti-Drug Abuse Act），同样被判处五年以上刑期，块状可卡因（crack）的判刑标准为 5 克，粉状可卡因的判刑标准为 500 克；同样是十年以上刑期，块状可卡因的判刑标准是 50 克，粉状可卡因则是 5 公斤。国会在毫无任何科学根据的基础上，声称块状可卡因比粉状可卡因更危险有害；但其实二者的唯一差异在于，块状可卡因由于杂物多、纯度低而价格便宜，其主要受众为街头贫困黑人，而粉状可卡因由于纯度较高、价格昂贵，所以主要受众为中产阶级白人学生。尽管黑人与白人持有或吸食可卡因的比例大致相当，但由于二者在量刑标准上存在 1: 100 的差距，致使黑人大量因为持有可卡因而入狱，而中产白人却可以毫无顾忌地吸食可卡因而不用担心面临牢狱之灾。

在毒品战争的具体执法过程中，黑人同样面临隐形歧视。虽然白人与黑人在每月非法毒品使用率上相差较小，但每十万人毒品相关逮捕人数上二者却存在显著的差异，其原因在于警察执法所需的“靠谱原因”（Probable Cause）这一低标准，使得警察能够轻易拦截搜身（Stop Question Frisk）；由于警力更多布置于黑人社区，且白人很少遭遇拦截搜身，最终黑人入狱的概率更高，面临的刑期也 longer。比如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黑人车辆在白天被拦截搜身的概率远高于白人，但在夜晚警察看不清司机肤色时，二者概率相近，可见种族歧视因素在拦截搜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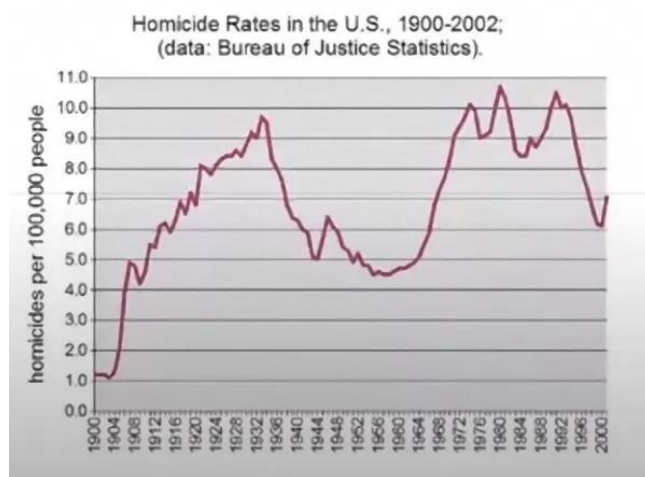
白人与非裔的毒品使用比例与毒品相关逮捕比例

70 年代不仅入狱人数大规模增长，因判刑要求等待法庭审查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法院面前排起长队，许多人被关押于条件恶劣且拥挤的拘留所中，也有不少人面临未被法院审判而被警方拘捕多年的情况，这使得被告认罪以换得检察官部分让步的辩诉交易（Plea Bargain）变成常态，有研究者评估约 90% 至 95% 的联邦法庭与州法庭案件通过该方式被解决，许多缺乏法律知识的黑人在警察的恐吓下认罪，而公派律师因单个案件收入微薄也常劝诫被告认罪，以减短案件审理时间。保释金（bail）与审前拘留（pretrial detention）制度进一步恶化了付不起高额保释金的穷人的处境。根据 2010 年数据，纽约拘留所中有 39% 的人（绝大多数来自贫困黑人社区）是因为无法负担保释金，才一直处于拘留状态。由于毒品战争导致被拘留人数激增、排队等候庭审时间过于漫长，保释金也被做成了一门生意：警方常与地方上放高利贷的人串通，一旦有拘留时，放高利贷者便闻风而动，借钱给被拘留者的家庭帮助保释，等到出庭日拿回本金时，这些家庭早已因此背上沉重债务。

90 年代，克林顿政府由于共和党人的压力，进一步强化“法律与秩序”，于 1994 年出台《暴力犯罪控制与执法法案》（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其中三振出局法（Three-strikes law）让罪犯第三次判刑面临更严格的处罚，强制服刑时间（Truth in Sentencing）则使得犯人即使在忏悔罪行、表现良好的情况下也难以减刑，这些法令都间接恶化黑人在监狱内的生存环境。一系列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八九十年代黑人被监禁的人数飞涨。

今天回顾这一系列法案时，人们关注的焦点往往在于尼克松与里根政府如何利用毒品战争作为口哨迎合后民权时代白人的喜好以打压民权运动，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法案的制定与实施还有其它更复杂的时代背景。从 60 年代到 90 年代，虽然原因尚无定论，但美国犯罪率确实有上涨，共和党的作为多少可被称为响应民意，而 90 年代后犯罪率下跌，也有不少人将其归因于严刑峻法，尽管后来的研究已经基本上否定了这种归因（虽然其他发达国家的种族构成与美国不同，也没有采取大规模囚禁的手段，但 60 年代到 90 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发达国家犯罪率均有大

致同步的变化，可见美国国内的严刑峻法并不足以解释犯罪率的下跌）。在这一时间区间内，美国社区（包括黑人社区）对犯罪问题的焦虑普遍漫溢，当时的黑人社区领袖也对严刑峻法打击犯罪的策略有着较高的支持率，而这一政策对黑人社区的危害却是在一两代人后才显现的。犯罪率虽然有跨越几十年的变化，但它被作为官方的政治问题出现则是媒体、草根团体、政党共同作用、共同呈现的结果。在大众媒介的呈现中，犯罪问题则被潜意识等同为贫困黑人社区问题，过分夸大黑人社区而忽略白人社区的犯罪问题在大众媒体中十分常见。



1900-2002 年凶杀率

七十年代以来的所谓“毒品战争”及其导致的“大规模囚禁”，反映的不仅仅是白人主流社会对黑人的歧视、恐惧、误解和排斥，同时也部分源于黑人社会内部的阶层对立、后民权时代社区重建的路线分歧、以及对主流社会种族主义话语的内化；“毒品战争”之所以造成始料未及的恶果，并不是某个特定重大政策使然，而是在整体扭曲的、被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所塑造和框限了的政治大场域下，不同时间点上诸多微小政策细节前后叠加所引发的质变。

监狱，是生意也是政治

大规模囚禁意味着监狱数量的增多，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经济资金来兴建管理监狱，在这一背景下，私营监狱在美国应运而生（2019 年数据，私营监狱关押人数，占美国关押人数的 9% 左右）。除了私营监狱外，公立监狱也基本上将后勤等服务外包给私营公司。政府对于监狱的监管与后勤问题态度冷漠，往往与私营公司签订十几二十年的后勤长合同，对合同的执行质量不闻不问，使得监狱环境不断恶化。以监狱中最为典型电话服务为例，监狱电话不但每分钟收取高于外界数倍的价格，而且往往还要求囚犯购买包含高额手续费的电话卡以获取额外收入。在面对监狱内杂多且高昂的收费的同时，无法集结工会保障权益的囚犯又被当作极其低廉的劳动力，为与监狱签订劳务合同的诸多大公司进行生产，其时薪远低于外界的最低时薪。二者共同作用的最终结果往往是出身于贫困社区的囚犯在监狱中欠下高额债务。

作为一门庞大生意的监狱，让其运营企业有强烈的动力去游说议会，让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通过更多有利于大规模囚禁的法案条例。作为大企业联合组织的 ALEC（American Exchange Council），在监狱问题上游说共和党议员以建立更多的监狱，并减少政府对监狱的监管。

近年来，监狱问题进入公众视野，来自公众的压力迫使监狱进行改革，为减少监狱人口和监狱拥挤问题，美国政府放出部分囚犯，并用代以 GPS 脚铐监视，而推动 GPS 监视手段的则是 GPS 脚铐生产厂商，把人关进监狱是生意，放出监狱同样是生意。

监狱除了带来经济收益外，还能够在政治上产生直接效果。在监狱的选址上，全美 98% 的监狱建立在全白人的共和党郡中。根据一项 2004 年报道，全美 21 个郡 21% 甚至更多人口为监狱囚犯。为什么这些郡要抢着修监狱？其直接原因为美国选区划分（包括州议会选举和国会众议院选举的选区划分）依据为区内目前所在居民人口，这一标准包括监狱中的囚犯，如果除去监狱人口，人口不足的郡需要与其他郡合并成为一个选区，或者至少要减少在州议会中的席位；这些共和党占优势的全白人郡，通过将外地的犯罪人口集中到本地监狱中关押，一方面可以提高本地“居住人口”的数量，另一方面由减少了少数族裔聚集的民主党大选区（如洛杉矶、旧金山）的“居住人口”，在选区划分和投票统计上大大有利于共和党。

21 Counties Have 21% or More of their Population Incarcerated

County	State	Census 2000 Population	Percent population incarcerated
Crowley	CO	5,518	35%
West Feliciana	LA	15,111	33%
Concho	TX	3,966	33%
Union	FL	13,442	30%
Brown	IL	6,950	28%
Lake	TN	7,954	27%
Mitchell	TX	9,698	26%
Greensville	VA	11,560	26%
Lassen	CA	33,828	25%
Anderson	TX	55,109	25%
Hartley	TX	5,537	24%
DeKalb	MO	11,597	23%
Jones	TX	20,785	23%
Walker	TX	61,758	23%
Childress	TX	7,688	22%
Karnes	TX	15,446	22%
Bee	TX	32,359	22%
Lincoln	AR	14,492	21%
Johnson	IL	12,878	21%
Pershing	NV	6,693	21%
Madison	TX	12,940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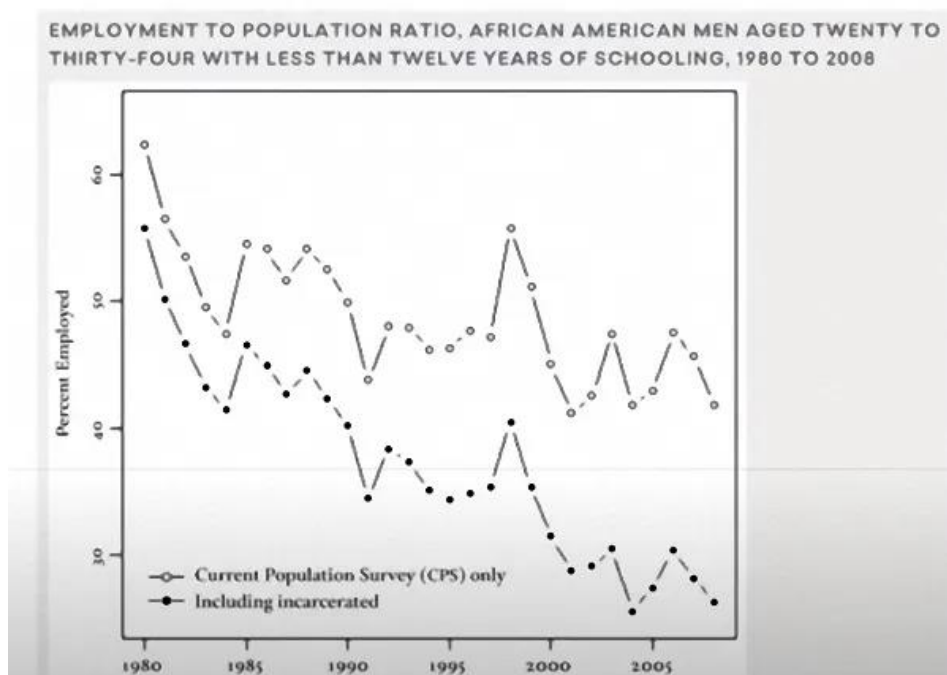
各郡监狱人数占总人口比例

与此同时，犯人与前犯人的投票权剥夺，也对共和党明显有利。1974 年 Richardson 诉 Ramirez 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可以禁止被定罪的重罪犯投票，即出狱后，囚犯的投票权依旧是被剥夺的，自 2000 年至今，美国 50 个州中有 46 个州，4 百万囚犯在服刑期间的投票权被剥夺，还有 14 个州永久剥夺了 150 万曾有犯罪记录者的投票权。

2006 年 Christopher Uggen & Jeff Manza 的研究《Locked Out》分析了 1970 到 1998 年间，至少 7 次国会参议院选举，其结果因犯人剥夺投票权而改变。尤其是 1994 年（克林顿上台后第二年），共和党右翼保守派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几十年来第一次夺取国会主导权，此后直到 2006 年一直占据了参议院的多数。根据该研究，如果犯人的投票权未被剥夺，1994 年将是民主党而非共和党获得中期选举的胜利，美国当代政治史的走向将截然不同。另一项 Elizabeth Hull 2006 年的研究发现，如果犯人有投票权的话，2000 年与 2004 年两次总统选举，小布什都将失败。

综合以上因素，仅从政治角度考虑，共和党也有迫切的动机维持大规模囚禁的现状。比如 2018 年佛罗里达州举行公投，绝大多数人支持将投票权还给犯人。但在公投结果出炉后，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马上又通过新法案，规定出狱人士需要先还清狱内欠债才可重获投票权，变相地继续剥夺贫困底层出狱者的投票权。地方法院旋即宣布佛罗里达州议会的这项法案违宪；此案目

前仍在上诉过程中。



1980-2008 年间，在校时间少于 12 年的 20-34 岁的黑人男性雇佣比例（图源：Bruce Western & Becky Pettit (2010), “Incarceration & Social Inequality”）

对黑人社区的影响，在 1980-2008 年间低学历年轻黑人男性雇佣比例不断降低。1980 年即使加上监狱中关押的囚犯，其雇佣比例仍超过 55%，排除监狱里面的服刑囚犯则有 64%，2000 年总雇佣比例则下降到了 30% 以下，即便不算服刑囚犯也仅为 40% 左右。雇佣比例不断降低的原因在于，入狱非裔出狱后，在求职过程中，雇主可以要求浏览应聘者的犯罪记录，而犯罪记录不仅会影响年轻男性非裔的求职，还会为其贷款申请增加难度。而且有研究表明，即便禁止雇主了解应聘者的犯罪记录，也无益于现状，因为大部分雇主会假定所有非裔有犯罪记录而拒绝雇佣，可见在黑人高犯罪的成见已经深入人心的前提下，如果不从法律、经济、政治的结构性层面着手纠正不公，个人就会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而拒绝雇佣非裔。

大规模囚禁对民权运动和黑人社区的打击

一些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政策与法律（如种族隔离与 Jim Crow laws）在大众眼里是需要被解决的政治问题，但当种族问题被等同于犯罪问题，则会使对政治理解有限的中产阶级对该问题敬而远之，当黑人与犯罪被划等号后，种族问题便被排除到政治议题之外不再被关心，这便是种族问题“去政治化”。另一方面，由于媒体很难进入监狱观察采访，监狱围墙后的骚乱相对比街头运动，对媒体而言变得不再“可见”，大众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直观地了解到监狱背后的民权问题。

由于监狱内部环境恶劣，以自保为目的的少数族裔帮派集结变得十分普遍，监狱中的主要矛盾也变为了少数族裔之间的利益纷争，而不再是占据社会主流优势的白人与少数族裔之间的矛盾，白人占大多数的狱警以置身事外的仲裁者角色出现，不再被卷入矛盾之中。

1996 年的监狱诉讼改革法案 (Prison Litigation Reform Act) 同样是致使监狱环境恶化的一环。八十年代早期入狱的非裔因民权运动经历，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于是对监狱恶劣环境与不公对待的控诉案件占据了八十年代法院案件的半数以上。为了压制狱中非裔的控诉，改革法案使监狱内部的“申诉程序”行政化、复杂化，而被狱警虐待的犯人，如果“没有及时走完监狱内部的申诉流程”，则法院不得受理其控诉。

黑人文化的所谓“推崇犯罪”，正是大规模囚禁的畸形结果。在监狱受到心理创伤与习得暴力的非裔，在出狱后将监狱习性带回了黑人社区，使黑人社区形成了街头“忤逆”文化。同时，由于出狱后在求职等方面四处碰壁，大多数有犯罪记录的非裔只能投靠街头帮派维生，形成重复犯罪、从小罪到大罪的恶性循环。大规模囚禁同样破坏了非裔的家庭结构：由于成年黑人男性大量入狱，黑人家庭大量沦为单亲家庭；60年代只有大约两成非裔家庭为单亲家庭，现今却有超过六成的非裔家庭为单亲家庭。

总结一下：整个二十世纪，黑人社区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被不断剥夺，造就了黑人社区的贫困（民权运动后黑人中产阶层从黑人区的迁出，也恶化了种族与阶级交织的贫困问题），但当代黑人社区贫困与治安问题的迅速激化，终归是在70年代大规模囚禁兴起后。如果仅仅看到“（当代）黑人犯罪率高”，而不去反思“为什么黑人犯罪率高”、不对美国社会与制度中的系统性歧视进行整体性的改革，就永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警察暴力的政治学

2015年《卫报》曾报道芝加哥警察局刑讯逼供的新闻，而在近期的游行中我们也常看到警察用武力对待示威者引发诸多争议，那么为什么美国的警察如此暴力？

19世纪前，美国并没有职业警队，维持社会秩序主要依靠临时召集非职业公民巡逻队（Patrol）。相较北方，南方的城市守卫队（City Guards）1830年从奴隶巡逻队（Slave Patrols）转型而来，目的在于监视和恐吓城市中的黑人；北方职业警队的诞生则是因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北方需要打压移民、工会、少数族裔等所谓的“社会不稳定因素”。19世纪50年代，芝加哥市政府在成立警察局时曾声称，城市发展必须要遏制密集人口中的不稳定因素，即便这些所谓的“不稳定因素”并没有真正犯下什么罪行（not criminal in particular）。镀金时代，警察局则替作为市政府金主的企业主打压工人罢工。19世纪末美国开始推行公务员改革（包括警队改革），入职考试与训练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警察素质，但各地在实际操作中的具体做法和效果相差巨大。比如2000年康涅狄格州Jordan诉The City of New London的案件中，警察局以申请人在认知考试上获得高分为由拒绝了其入职申请，理由是智商较高的人不容易服从管束，而警察作为国家暴力机器必须服从命令，不能随便质疑命令的合理性（比如过于暴力的镇压命令）。法院在判决中站在了警察局的一方。

美国历史上少有的警察改革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厄尔·沃伦（Earl Warren）在最高法院担任首席法官期间。沃伦法院是美国高院极少数由进步派占主导地位的阶段，支持民权运动，并尝试推动警察改革。沃伦法院做出了几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极大地改变了刑事诉讼程序，比如1961年Mapp诉Ohio案件中，裁定禁止检察官在法庭上使用违反美国第四修正案获得的证据；1964年Escobedo诉Illinois案件中，裁定警察不能刑讯逼供、审问时犯人可以要求律师在场；1966年的Miranda诉Arizona案件中，要求警方在拘留嫌犯时需向犯人告知他受宪法保护。这一系列案子建立了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美国刑事诉讼程序。

与此同时，高院的这些改革也招致了保守派“给警察带上了手铐”的谩骂，加上民权运动引起保守派白人的反扑，使得沃伦高院遭到民意的剧烈反弹。1966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因此大败，虽然仍掌握两院多数，但参议院丢掉了3席，众议院丢掉了47席，州长丢掉了8席。沃伦高院开始在民意面前退缩；沃伦下台后，重回保守派控制的高院更是重新偏向于警察系统。在高院“后改革时代”的一系列涉警判决中，影响最深远的有两项。其一为裁定警方具有“有限豁免权”（Qualified Immunity）。假如有人起诉警察暴力执法，需要在警方所在辖区内找到事实极其接近并胜诉的既有案例；若没有先前判例，法官将不受理该案件。考虑到每个案件的事实细节均存在差别，普通人也很难有渠道接触卷宗，使有关警察暴力的诉讼往往无法得到受理。其二是将英美普通法传统中的“特殊义务”概念加以扩大。在普通法传统中，警方没有一般性义务去保护所有公民（no general duty to protect the public），只有在与当事人已经建立“特殊联系（special

connection) ”的情况下才有保护的义务。这个概念的初衷是避免警方在警力有限的条件下承担过多责任；但高院在 1989 年 DeShaney 诉 Winnebago County 等一系列案件中，将“人身限制令 (restraining order)”等等都划在了“特殊联系”的范围之外，为警方的不作为提供了各种借口。换句话说，美国的警察在最高法院的护持下，既不会因为暴力执法而被追责，也不会因为玩忽职守而被追责，成为了一个可以任意施为的庞然怪兽。

此外，公民财产没收法 (Civil Asset Forfeiture) 使得执法人员可以在不必控告的前提下，没收涉嫌犯罪或从事非法活动的人的财产，例如警察搜查一辆车，最后即便没有任何理由逮捕，警察也可以以“潜在犯罪证据”的理由把搜查到的财物占为己有。这一遭到很多人批评的情况目前依旧是合法的，而且在被没收财物的人中，85%的人后续并未被逮捕或起诉。理论上财物可通过程序要回，但因复杂的法规程序限制，加上畏惧警察报复，绝大多数人会选择放弃要回财物。在美国地方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没收公民财物成为了许多地方公安部门的重要营收手段。

今年三月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黑人女护士 Breonna Taylor，被闯入家中的便衣警察射杀。这些警察的目标本来是另一家人，但是走错了门，闯入 Taylor 家中后又拒绝出示搜查令或者警察证。Taylor 的男友怀疑他们是入室抢劫犯，拿出枪要求他们离开，警察就开枪打死了 Taylor 并逮捕了她的男友，却并没有因为闯错门和无故杀人而受到追究。在 George Floyd 事件之后，Taylor 之死也被抗议者重新提起。路易斯维尔市迫于抗议的压力，立法禁止了“身上有搜查令却拒绝出示、直接闯入嫌疑人家门” (no-knock warrant) 的做法；但这种做法在美国大多数州仍然是被允许的，也造成了许多黑人即便没有犯法，住在家里也时刻惴惴不安，生怕随时被警察破门而入、出于误会而丧命。

另一个近日被废除的法案是 1974 年由共和党议员们呼吁立法的纽约 Section 50-A。该法案规定，除非警察本人同意，警察过往的投诉记录均不予公开。明尼苏达州 George Floyd 事件后，记者发现杀害 Floyd 的警察 Derek Chauvin 先前曾有 18 次暴力执法的投诉记录；相同的情况如果发生在纽约，由于 Section 50-A 的存在，记者将无法接触到该警察的过往投诉记录。2014 年纽约警察 Daniel Pantaleo 以锁喉手段将黑人小贩 Eric Garner 窒息致死之后，纽约公众曾经要求议会废除 Section 50-A、公开 Pantaleo 过往的暴力执法记录，但遭到势力强大的纽约警察工会反对无疾而终。直到此次 Floyd 之死引发的抗议，纽约议会才终于将这条恶法废除。

美国警察暴力程度的上升，也与过去几十年间警察装备的升级与“军事化”密切相关。比如 1991 年海湾战争后，美国国防部根据 1997 年的 LESO (Law Enforcement Support Office) 1033 Program 转让战后派不上用场的军事装备给全美各地警察局，至 2019 年共转让了价值 51 亿美元的军用武器；911 之后，国土安全部又根据 HSGP (Homeland Security Grant Program) 计划，向地方政府提供“反恐”相关的经费支持（今年下发的经费为 18 亿美元），其中规定至少 25% 的经费必须拨给公安部门，用于购买军事装备和培训等等。警察的军事化，加上美国枪支泛滥导致警察面对嫌疑人时神经紧绷，令警察执法暴力更上一层楼。

保护警察的法律层出不穷，一大原因在于警察工会本身是重要的政治势力。公安部门属于地方政府管辖，而地方政府在美国的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中处于极度弱势地位：联邦宪法只划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责，对地方政府的权力不予保护，而州宪法又往往对地方政府的人事权、财政权、立法权等等做出极大限制，令其难以约束治下的公安部门。公安部门由于能为地方增加收入（如前面提到的公民财产没收）、维持治安，也令地方政府不忍下手改革。同时，警察工会能以怠工和选举作为威胁；比如九十年代克林顿政府对犯罪问题的态度转向强硬，与警察工会发出的怠工威胁有关，尤其是当时犯罪问题还被公众视为重要社会问题，使警察系统对政客的怠工威胁十分有效，生怕一旦警察怠工、犯罪率回升，自己的政治前途就会完蛋，因此宁可放任警察胡作非为而不予改革。

警察系统与工会内部本身亦存在种族秩序，比如纽约市，基层警察中非白人占 53%，白人占 47%，但随着级别越高，白人比例也越高，到了警佐（sergeant）一级，白人已经占到 61%；警司（lieutenant）一级，白人占 76%；总警司（captain）一级，白人占 82%；工会领导层与活跃分子更基本上全是白人。类似地，尽管女警察占纽约警察的 20%左右，但警官与警察工会领导里基本上没有女性。警察系统对种族歧视问题与性别歧视问题的不敏感，和内部的这种种族秩序、性别秩序，有着很大的关系。

【网络文章】

社会运动与黑人解放的公众记忆

夕岸

澎湃思想市场<https://mp.weixin.qq.com/s/GQgxY3O1Fayo3HIyLk7zyg>（2020-7-9）

美国明州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白人警察压颈致死，引发全国至少 140 个城市爆发抗议示威，少数城市出现了激烈的暴力抗议。伴随过去已长达两周的抗议，已有一系列复杂的话题被广泛讨论。

7 月 4 日，在纽约文化沙龙和湾区文化沙龙主办的“种族问题和撕裂的美国社会”线上系列沙龙的第四期中，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夕岸以《种族与美国的社会运动版图》为题，对美国黑人运动进行了历史脉络梳理。讲座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谈及为什么特定的社会抗争和国家暴力的历史被淡化甚至抹除，以及民权运动衰落后黑人权力运动对民权运动意识形态的挑战和超越。其次是美国左翼运动中的种族问题，移民所激化的种族与阶级矛盾如何在过去一百多年不断撕裂美国的激进主义传统。最后进入这一波“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从其所体现出的特征里可以瞥见的历史上黑人运动的遗产。夕岸将讲座的文字稿授权澎湃新闻刊发，以飨读者。

今天人们谈论社会运动的时候，他们不仅仅在谈论运动本身，而更是在塑造一种历史视角，一种事后理解和记忆运动的方式。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同时是被传媒体系和学术研究过滤的，过滤过的事实会被印刻成历史成为一种公众记忆和政治论证的文本被不断唤起。

比如 1960 年代中期出现的黑人权力运动，到现在都没有很多影像记录和学术研究。唯一较为完整的纪录片是瑞典电视台记者拍的 The Black Power Mix Tape，记录了 1967 到 1975 年间和黑人权力运动相关的一些零碎的影像，十年前整理成片在美国上映，但因为有很多素材遗漏，一些年份甚至完全没有素材，所以整个视角不是很全面。但 1960、70 年代没有一家美国媒体愿意去深入采访黑人权力运动，所以连纪录片都是外国人完成的。而且当时瑞典的拍摄团队还受到了多方阻拦，被美国政府和媒体机构批评传播负能量，看不到美国社会进步的一面。

美国社会对社会运动的记忆僵化而存在极强的种族偏见。首先，社会运动历史有很强的白人中心主义。大量研究都聚焦在白人主导的运动，比如新左派运动。同理，有中文翻译版的书籍也基本都局限在新左派运动。还有大量研究是关注民权运动期间的一些运动，比如静坐抗议 Sit-in 如何影响南方白人的态度。这个不言自明的假设是黑人运动的成功要由白人来定夺。此外，白人男性也主导着历史叙事。新左派的回忆和论述被白人核心参与者所垄断。社会运动研究作为一个跨社会学、政治学的子学科，内部的种族和性别分化也极为严重。且不说理论研究三大家蒂利、

塔罗和麦克亚当都是白人男性，几乎没有有色人种女性活跃在这个领域，她们一旦从事类似的研究，也会被学界的本质主义思维看作仅仅是研究种族、女性，而不是研究广义社会运动的学者。一般的社运研究者，也绝少自己亲身参与运动组织工作，研究和社运实践间常有巨大的脱节。

前面这两个因素当然也受制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即社会运动历史档案上的偏见。白人运动和比较温和的黑人运动参与者的记录更完备。麦克亚当（Doug McAdam）有本代表作叫《自由之夏》，讲述参与“自由之夏”项目对志愿者人生的长期影响，他们参与以后怎么开始思考改变社会，在今后的人生中更多参与政治。但麦克亚当之所以可以写这本对社运研究几乎是奠基性的书，正是因为“自由之夏”的九成志愿者都是白人，所以档案资料非常齐全完整。黑人组织，特别是激进黑人运动的资料非常零散，并且很多掌握在 FBI 和 CIA 手里，即使资料解密也要等好多年。新曝光的故事也会颠覆人们的认知，比如当年黑豹党唯一做到高层的日裔美国人 Richard Aoki，也是 yellow peril supports black power 那张著名图片中的东亚男性，2012 年才被曝光其实是长期的 FBI 线人，他成功打入多个组织内部，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无数重要情报。

具体到 50 年代开始的黑人解放运动，它历史呈现的问题就更为集中。我在这里总结五点。首先是领袖为中心的记忆和分析，特别是在阐述黑人运动分歧的时候会调出马丁·路德·金（MLK）和马尔科姆·X，似乎其他人的运动都是这两个人的注脚。即使谈论别的组织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一说到黑豹党就联想到 Huey Newton，而不太关注其他成员，特别是女性成员的贡献。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镇压被大量淡化。最典型的例子是 1950-70 年代 FBI 在胡佛任下违法的 CO unter INTEL ligence PROgram，简称 COINTELPRO。这个项目跟踪民权运动、新左派、黑人权力运动和激进左翼里大大小小的组织。FBI 也直接策划了黑豹党新星 Fred Hampton 和他保镖 Mark Clark 的刺杀。当时 Hampton 只有 21 岁，组织了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跨族裔联盟 Rainbow Coalition，邀请了各个族裔的激进组织加入。这场官方拒不承认的谋杀也是黑豹党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暴力镇压外，官方还通过伪造通讯等方式来对黑人运动各个击破，比如他们会伪装成其他组织的成员写信辱骂黑豹党，挑起组织之间的不信任，或者大肆宣扬某人是 FBI 或者 CIA 线人，这种策略也被叫做 Bad-jacketing。FBI 的 COINTELPRO 项目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 1971 年有八个行动者潜入了宾州 FBI 的地区办公室偷走了一千多个文档，这些行动者后来把文档全部公布给了主要媒体和国会，否则相关信息要晚几十年才会解禁。如今虽然 FBI 的监控和镇压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它们旗下依然有专门的针对黑人激进派的监控项目，比如 2017 年泄露的文价显示 FBI 把“黑命攸关”看作“Black Identity Extremism” Movement 的一部分，但这个运动完全是他们杜撰出来的。

在主流的论述中，黑人激进主义一直被认为是暴力的，分离主义的，引发社会撕裂的。即使是民权运动的支持者也往往持有这样的立场。比如 Todd Gitlin 等白人新左派一直以来都声称黑人激进派毁掉了民权运动族裔团结的改革成果。他们还认为黑人激进派背叛了民权运动，从而导致 70 年代保守主义和文化战争的兴起。但其实真的去看 1960，70 年代历史，会发现 1960 年代的运动在当时未必弥合了社会分歧，那些黑人白人并肩作战的图景本就有很多浪漫化的成分，反而被认为是分离主义的黑人激进派在 70 年代后做了很多族裔团结的工作。

黑人运动历史里的女性，特别是底层女性的参与一直是被淡化的。比如知道 Claudette Colvin 的人远远少于 Rosa Parks 的，尽管前者才是第一个拒绝给白人让座的人。因为相比 Colvin, Parks 更符合抗争者的刻板形象，她是一个已婚的制衣女工，又在当地的 NAACP 任职，所以当时 NAACP 有意把她塑造成领袖。但 Colvin 是一个拒绝让座后不久就怀孕的 15 岁单身黑人女性，她的身体是被社会污名化的，当时哪怕在黑人社区也没有一个行动家愿意宣传她的事迹。另外，Angela Davis 在很多不同场合也提到过无数普通黑人女性的抗争造就了马丁·路德·金，比如当时蒙哥马利的公车抵制一开始是黑人女性组织发起的，而且搭乘公车的也大量是需要通勤的服务业黑人

女工，但后来的历史叙述更多强调的是 MLK 等人事后介入的组织工作，马丁·路德·金也因此成为了民权运动的核心人物。社会学家 Belinda Robnett 的研究还揭示，民权运动时期绝大部分黑人组织和黑人教堂普遍排斥女性的核心领导位置，黑人女性最多只能提拔到中层。所以组织内的排斥反向刺激她们去做更多协调、联络、教育的工作，成为了链接不同社区的节点。当时 SNCC 就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创办者 Ella Baker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她做了很多运动的幕后工作，包括挖掘和培养下一代行动者。由于非常反感克里斯玛式的领导人气质，她更加亲草根的行动风格也让她在民权运动的记忆中处在更边缘的位置。

最后一个是美国在任何话题上都非常擅长的美国中心主义。除了越战外，历史叙述很少把美国置于全球运动和冷战的框架下看。进入 21 世纪后这方面的论述多了很多，但总的来说还是十分不够，而且既有的论述很多都比较第三世界浪漫主义，没有太多分析 1960，70 年代国际主义背景下更复杂的政治运动之间的博弈。

美国对六十年代的论述经常被置于一种简化的“Good Sixties/Bad Sixties”的二分，大概就是六十年代的前半段是好的，运动都很非暴力，在体制框架内进行，也获得了一些民权上的进步。到了六十年代后期黑人权力运动兴起，一切都划向了暴动和骚乱。关于六十年代这种二分法记忆如何被固化的著作也很多。第一本叫做 *Framing the Sixties*，是从政党政治的角度看两党政治人物怎么唤起 60 年代的记忆来为自己政党的议程服务。还有一本 *The Bad Sixties* 对 1980、90 年代的影像作品做了分析，发现主流文化界通过突出好的六十年代和各种白人亚文化产品，来有效消解黑人运动的政治性。人们可能会一边欣赏黑豹党的着装，认为他们开创了一种时尚潮流，一边反对他们背后黑人自决的意识形态。另一本书 *A More Beautiful and Terrible History* 则反思了美国社会如何通过纪念民权运动来推卸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历史负担。民权运动被描述成一种美国社会的自我净化和救赎，为之后的色盲政治（Colorblindness）铺路。

黑人权力运动的崛起和遗产

尽管民权运动时期就有了黑人权力（Black Power）的思潮，但是整个黑人权力运动崛起还是在 1960 年代末期特别是 1968 年以后。对主流民权运动和 SNCC 在选举政治上努力的失望，从马尔科姆·X 到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的被刺杀所引发的普遍绝望情绪是很直接的诱因。越战也为黑人激进思潮的传播创立了机遇，因为第一次黑人，尤其是参战黑人直观感受到自己作为被压迫者，和被屠杀的越南人命运是相连同构的。前 SDS 成员 Max Elbaum 在 *Revolution in the Air* 里引用过一个 60 年代末的调查，显示 30.6% 参军的黑人希望回到美国以后加入一个类似黑豹党的激进黑人组织。

人们事后回望 1960 年代的时候往往忽略的一个背景是，当时即使是早期马丁·路德·金这样的温和立场，美国社会上支持他的人也是极少数。1966 年其实只有 28% 的美国人觉得对马丁·路德·金有好感，说明民权运动在当年是绝对不具备舆论基础的。1961 年五月底盖洛普针对刚开始的跨州 Freedom Riders 运动的调查，六成被访者都持反对态度。更能说明问题的是 1963 年 March on Washington 前后的舆论对比，黑人非暴力游行后，社会反而对黑人运动更抵触了，认为非暴力抗争伤害种族平等的比例从 60% 飙升到了 74%。1966 年的数据呈现同样的趋势，85% 的白人都觉得民权运动伤害了黑人追求平等。所以很多白人新左派宣称的“美国社会舆论因为黑人权力才走向保守”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种族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不会因为一个社会运动和理非而对它寄予更多的同情。所以是一直以来都十分坚固的白人至上思潮推动了黑人权力的崛起，而不是反过来的。

Do you think mass demonstrations by Negroes are more likely to HELP or more likely to HURT the Negro's cause for racial equality?		
	June 1963	May 1964
	%	%
Help	27	16
Hurt	60	74
Make no difference	4	4
No opinion	9	6

GALLUP

1963年 March on Washington 之前和半年后的舆论对比。

一般认为最早的黑人权力组织是 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 (RAM)，虽然当时并没有 Black Power 这个概念，但这个组织在黑人高校发展开始就一直强调全世界黑人的解放，它也比黑豹党更早接触到毛主义和列宁主义。因为 RAM 活跃的时期还在民权运动鼎盛时期，所以他们为了避免国家镇压一直是半地下工作，也导致这个组织虽然实际规模很大，旗下很多分部，但资料留存下来的非常少，很多都来源于 CIA 和 FBI 的档案。比如后来根据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公布的 60 年代 CIA 资料就显示他们被官方认为是当时最危险的组织。RAM 也激励了马尔科姆·X 和黑豹党的创办，前者在伊斯兰国度之前是 RAM 的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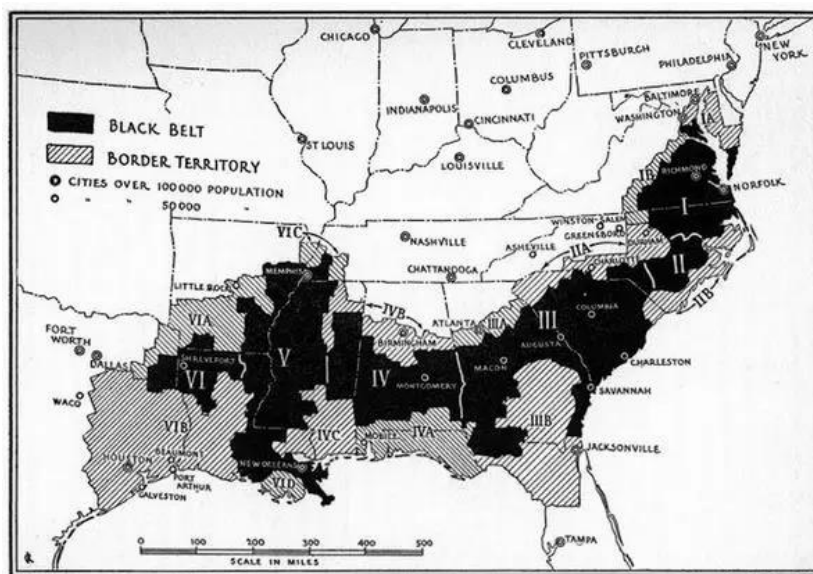
提出“黑人权力”这个概念的是 Stokely Carmichael，他是在 1966 年 March Against Fear 中一场密西西比的集会上喊出这个口号的。早年他也是支持民权运动的温和派，参与过 Freedom Riders 运动，受到前述提到的 Ella Baker 影响，也领导过 SNCC，但 1960 年代中期他基本已经对民权运动的路线不再抱有幻想。Stokely 喊出“黑人权力”的口号后，大部分民权运动领袖十分恐慌。当时的 NAACP 主席 Roy Wilkins 直接说这是“the father of hate and the mother of violence”，马丁·路德·金也认为这个口号“unfortunate”，让 Stokely 收回，被后者严词拒绝了。这种路线分歧除了时代变迁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代际问题。Stokely 是 1941 年出生的，马丁·路德·金是 1929 年，差了十几岁，所以 Stokely 回应的时候说我很尊重金博士，但是我们年轻人可没有他的耐心。在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前 Stokely 和他还是有一些策略上的合作，但 Stokely 在立场表达上从未妥协过。

马丁·路德·金与马尔科姆·X 的不同，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的分歧经常被简化成是否接受暴力。但更本质的不同在于看待黑人解放的途径，究竟是要求白人国家给自己赋权和法律地位，还是自己夺取和定义自由。Malcolm X 最著名的话之一就是“Nobody can give you freedom”。同时，黑人权力运动应该被看作一种网状的弥散式的结构，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派别。有些组织支持黑人分离主义和独立建国，还有一些组织会信仰革命社会主义，一些组织，像 Nation of Islam 有宗教色彩也不排斥资本主义，比如他们会支持黑人企业家创业。但黑人权力运动在整体的脉络上还是偏左翼，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可以将之和民权运动区别开来。

首先，黑人权力大大拓宽了民权运动的范畴。因为民权是相对自由较为狭窄的概念，后者还包括在经济、教育、医保、住房等一系列面向上的平等。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黑豹党 1966 年起草的纲领性文件 ten-point program，涉及免费医疗、教育、廉价住房和黑人免服兵役等问题，他们资金充裕的时候也一直在实践各种社区医疗教育治安项目。这种激进社区实践不只是内部试点，也激励了其他族裔的激进组织，比如另外一个纽约的亚裔激进组织 I Wor Kuen (IWK，义和拳) 就有 12-point program，而且它们的纲领相对黑豹党的有更强的性别意识，可能是美国所有激进组织里面最明确提出反对男性沙文主义的。

民权和黑人权力第二个根本性分歧和很多对于移民的争议是类似的，即美国的移民需不需要逐步融入白人社会，还是可以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而黑人权力在保留自己族裔文化政治的情况下，进一步讨论了自决和独立的问题。一个典型的支持黑人自决的激进组织是 1968 年在

底特律成立的新非洲共和国（RNA），RNA 希望五个黑人人口占比高的南方州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佐治亚和南卡独立建国，向美国索取每名黑人一万美金的奴隶制赔偿，等价于美国重建时期对黑人未兑现的承诺，同时请黑人投票自行决定是否加入新的国家。RNA 计划定都亚特兰大，还选了当时在中国流亡的黑人运动家 Robert F. Williams 当临时总统，国旗则模仿美国的设计但是采用泛非主义的红、黑、绿三色。这些纲领现在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当时这样的思潮绝对不是毫无社会根基的。RNA 成立初期全国媒体关注度很高，这个组织在政治打压下也一直存活到了 90 年代。针对 RNA 的研究非常少，唯一一本著作是政治学者 Christian Davenport 的 *How Social Movements Die*，分析 RNA 在国家镇压和内部派系分裂前逐渐衰落的过程。



BLACK BELT AND BORDER TERRITORY

RNA 计划的国土范围，来源于：<https://christiandavenportphd.weebly.com/republic-of-new-africa.html>

第三类分歧在于国际主义的程度。马丁·路德·金自己当然也会说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是重要的，但只有黑人权力运动真的建立了事实上的组织联系。黑豹党在阿尔及利亚的故事是这段历史的高亮时刻，目前对其最完整的叙述来源于 *Algiers, Third World Capital* 这本书。黑豹党的信息部部长 Eldridge Cleaver 在 60 年代末逃避审判流亡到阿尔及利亚，一开始受到新政府的欢迎成立了支部，对方还提供了办公场所。虽然 BPP 在海外只有这么一个分部，他们通过阿尔及利亚做了很多国际联络的工作，他还长期受到北越政府的资助。但随着时间发展，黑豹党的分部和阿尔及利亚政府就产生了很多理念和资金上的冲突，后者一直希望把前者纳入自己自上而下管理的体系，还两次收缴了海外给黑豹党的大量资助。所以从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到，一方面黑人权力运动的国际视角比民权运动要宽广许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国际连结内嵌在当时全世界的民族解放结构和美国国内对黑人运动的镇压里，这个外部条件的涨落还是很关键的。

为黑人权力运动提供国际背景的泛非主义有三个重要的时间点。从宽泛的意义上说，18 世纪末的海地革命就有了泛非洲主义的色彩。当时海地起义军甚至和大革命中的法国普通市民有了跨大西洋的团结。这在 CLR James 早年的著作《黑色雅各宾》里面有很细致的描述。现代泛非运动大概出现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那时候全世界激进思潮的传播都很快，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同一时期黑人激进派建立了很多跨国组织，都致力于全世界非洲裔的解放。当时虽然交通没有现在便利，但现代签证制度还没有建立，像美国是 1924 年随着颁布限制亚洲移民的 Johnson-Reed Act 才有了签证，所以运动家跨国迁徙和流亡某种程度上更为容易。本尼迪克特·安

德森在《全球化时代》还提到那时候具备的所谓早期全球化特征，电报、万国邮政联盟、蒸汽船和铁路建设都有利于跨国人口流动。到上世纪 60 年代的时候伴随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已有的泛非思潮正好和黑人权力运动对接起来，所以黑人权力运动里面不少人物后来也都参与了泛非运动，包括 Stokely 自己，他甚至为纪念泛非运动改名为 Kwame Ture。

牙买加人 Marcus Garvey 是早年泛非运动非常重要的人物，他 1914 年创办了最早的泛非运动组织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and African Communities League (UNIA-ACL)，当他移民到美国以后又在纽约哈勒姆建立了分部。加州奥克兰有个非常著名的黑人激进主义书店叫 Marcus Book 就是以 Marcus Garvey 命名，这次 BLM 抗议，他们书店也收到很多捐款。另一个重要组织是 1968 年由加纳流亡运动家恩克鲁玛成立的 All-Afric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后来 1972 年也有了美国分部，Stokely 1969 年逃亡非洲以后就长期负责这个组织。所以社运的国际联系并不一定是从欧美开始辐射向全球的，很多都是在其他地区先发起然后，通过国际移民传到了美国，对这种边缘到中心的模式关注的人较少。

很多泛非运动的人其实都出生在加勒比地区，Stokely 也是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加勒比行动者和美国社会运动的互动远远早于民权运动年代。比如 20 世纪初，就有很多加勒比的激进无政府主义者在纽约建立和参与了激进劳工和族裔解放组织，他们在哈勒姆文艺复兴中也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除了之前提到的早期全球化的趋势，历史学者 Winston James 这本 *Holding Aloft the Banner of Ethiopia* 里面分析到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勒比、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移民，相对美国本土的黑人平均教育程度更高，阶级意识更强，同时他们在移民到美国前对种族隔离的感受不深。这些人到美国以后接触到白人，才开始有了黑人的意识，但同时他们相对本土的黑人激进主义者更愿意与白人激进劳工运动家合作。也就是说加勒比的黑人激进派从 Marcus Garvey 到 CLR James 成为了美国白人激进派和黑人激进派间的桥梁，可以把种族和阶级的议题一起融合到解放性政治里头。这点非常关键，我在后面谈到左翼运动的种族问题时候还会进一步解释。

虽然上述提到的很多黑人权力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以往的成员和后代现在往往还活跃在社运一线，或是就现在的运动提出自己的看法。也有很多人创办了非政府组织。所以如今各个城市的运动经常还能带上当年运动的特色。比如 Emory Douglas 前几年拜访墨西哥萨民解驻地，和行动者对谈艺术和政治行动的关系，他们的对话成果还出版了书籍 *Zapantera Negra*。

黑人权力运动内部的意识形态多元而庞杂。黑豹党、Nation of Islam、新非洲共和国等组织获得了大部分媒体关注，但其实还有很多小的组织。我所生活的城市费城就有一个很著名的黑人激进组织 MOVE。MOVE 于 1972 年成立，除了黑人自决解放的纲领外，还有很强的绿色无政府主义色彩，比较反对工业化，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他们受牙买加拉斯塔法里运动的影响。这个组织本来是低调的，就在费城西边买了一排楼，组织成员过自治公社式的生活。但是 1978 年和费城警方对峙的时候，一名警察后颈被子弹击中身亡，为此费城警方坚称是 MOVE 方面开的枪，MOVE 说他们的枪都是坏的不可能走火，是其他警察扫射到死者。官方没有给 MOVE 太多辩护机会，重判了九个人谋杀，大部分人刑期判了 40 多年，媒体把他们叫做 MOVE9。目前这些人要么在监狱去世了，要么 2018 年以后才被释放，最新的情况是一位被判 42 年的成员 Delbert Africa 今年一月才被释放，六月就因癌症去世了。

1985 年的时候，MOVE 和警方再次发生冲突，由于警察无法让成员离开住所，他们就索性出动了直升机向 MOVE 的住所扔了炸弹，炸弹当时引发了现场大火，造成 6 名主要 MOVE 成员和 5 个未成年人死亡，60 多栋房屋受损。2013 年的纪录片 *Let The Fire Burn* 是关于 MOVE 和警方的冲突，片名就暗示说当时警方意识到房屋着火后，故意让消防车不要实施救援，等着火把 MOVE 成员吞噬。最后这场屠杀没有一个警官被审判。这场悲剧一方面导致 MOVE 基本被摧毁，另一方面也反向刺激了黑人权力思潮在费城的延续。

1960-70年代任何社会运动都沾染了性别主义的色彩。黑人女权艺术家 Michele Wallace 写过一本当年争议极大的书 *Black Macho and the Myth of the Superwoman*, 因为这是第一本揭露黑人权力运动内部性别压迫的书。她认为黑人权力运动的厌女情节体现在运动强化了 noble warriors 或者是 elderly statesman 形象, 要么是战士, 要么是年长的发言人, 都是非常强调男性气概的。而且很多运动组织本身一直在强调要恢复黑人男性在社会的主导地位。这个其实是对 1965 年一份著名的调查 Moynihan's The Negro Family 的反击, 当时这份报告认为黑人群体内部占四分之一的单亲母亲家庭导致了黑人过多依赖福利制度, 经济文化上陷入落后的恶性循环。这份报告撰写人 Moynihan 本人其实写到了奴隶制以降的系统性歧视才是导致黑人家庭瓦解的原因, 但后来这份报告完全被曲解逆练成为了保守派宣扬黑人“贫穷的文化”的证据。针对这种污名化, 黑人权力运动等于是用一种同样扭曲的、牺牲黑人女性自主性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黑豹党内部的性别歧视就很可能反映问题。Elaine Brown 写过一本回忆录叫 *A Taste of Power*, 她是 1974-1977 年黑豹党陷入危机时候的负责人, 因为领导人 Huey P. Newton 为了逃避审判流亡古巴, 所以指定她接任。当时黑豹党的影响力已经消退, 创办者之一 Bob Seale 已经因为内部分歧退党, 组织成员各奔东西, 剩下不到 100 人。Elaine 在非常不利的局面下其实做了很多组织工作, 包括拓展已有项目, 增强和其他组织和政客的合作, 极大延长了黑豹党的寿命。但后来大家在回顾黑豹党历史的时候, 倾向于完全忽略女性成员的贡献。Brown 在回忆录里直接指出黑人女性在黑人权力运动中被认为无关紧要的。即使女性作为领导人, 也被认为伤害了 black manhood 甚至黑人这个种族本身。

除了 Elaine 的回忆录外, *The Revolution Has Come* 是写黑豹党历史的书里比较有性别意识的一本。尽管鼎盛期黑豹党成员有六成是女性, 总部和绝大部分分部的性别分化和歧视是非常严重的, 比如后勤联络、教师和办报纸几乎都由女性操办, 主要领导层历史上只有三个人是女性, 而且都是因为和男性成员有亲密关系才被提拔。早期女性和男性的职位晋升渠道是完全分开的。组织内部集权也很严重, 不同意 Newton 的人会被开除。这本书里说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在组织发展后期, 由于女性成员的贡献长期被忽视, 上门来搜捕的警察不认为她们是关键人物, 于是长此以往, 组织里的男性都被抓走, 女性终于得以填补空白进入管理层。这与之前提到的黑人教堂排斥女性, 催生她们成为社区层面的召集人的例子异曲同工, 都是社会结构性歧视如何塑造女性运动家独特的政治抗争模式。

当然并非黑人权力运动就格外排斥女性, 事实上民权运动里性别歧视其实是更常见和直白的。“自由之夏”项目招募学生的时候, 筛选女性参与者一条很重要的标准是外貌。后来 McAdam 做研究时候意外翻出当年的档案, 发现负责人在审查申请者资料时候一直在评论女申请者的长相, 很多人因为外貌被拒绝参与。这些都构成了后来女权运动和黑人女权主义崛起的大背景。

美国左翼运动中的种族问题

美国左翼运动中的种族问题是最近很多人聊到的话题, 似乎“黑命攸关”这类黑人运动更多关注种族, 更少关注阶级的问题。前几天刚被清场的西雅图 CHAZ 占领区也出现了这个矛盾, 白人抗议者想把更宏大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的议程嫁接进来, 但一些黑人会觉得这些议题会妨碍“黑命攸关”和黑人解放这个更紧迫的焦点, 尽管 TA 们一般都承认新自由主义是个更本质的底色。这个争论其实一直存在, 比如 2018 年末新共和发了一篇文章“Do American Socialists Have a Race Problem”, 以美国目前最大的左翼激进组织美国社会民主主义 DSA 为例子, 讲述了美国社会主义者内部对有色人种的排斥。这篇文章当时引发非常大的争议, 因为左翼内部的白人很少承认自己有种族主义的问题。确实, 种族和阶级在美国政治里面一直是非常缠绕, 很多情况下甚至互斥的议题, 这也是导致和很多发达民主国家相比, 美国总体政治光谱相对保守的一个原因。

杜博依斯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黑人问题是对美国社会主义者最大的考验。”他在自己的

很多著作里都细致地刻画了劳工政治的种族主义倾向，白人劳工往往认为自己的劳权受损都是因为黑人的存在。Viewpoint 杂志的 Asad Haider 在 2018 年出版的 *Mistaken Identity* 里，也总结到白人之间的族裔团结一直以来高于美国有色人种之间的阶级团结。

对待黑人的种族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其他移民融入美国的粘合剂，**黑人是所有新移民共同的敌人，通过歧视黑人来融入主流白人社会的逻辑一百年来都没有变过**。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曾经分析过爱尔兰移民对黑人的仇视，他说爱尔兰人在自己祖国愿意和全世界无产者站在一起，但一到美国就被教育要仇视黑人，才可以成为白人。在《美国黑人的重建》一书中，杜博依斯一开始就提到了美国从 19 世纪初欧洲移民涌入，到内战再到 20 世纪初一直并行的两类劳工运动：一是黑人劳工获取法律承认，后来也成为民权运动的由头，二就是白人移民劳工争取土地和更高的工资，后来就演化成了很多早年种族隔离的工会比如 AFL。这两个运动偶尔会有一些联合，但是总得来说是互相冲突的。因为在不同时期，白人移民劳工，包括还有很多底层的白人都认为黑人压低了工资，抢了他们的工作。

现在关于欧洲移民怎么变成白人的著作已经非常多，最早有影响力的著作是 1991 年出版的 *The Wages of Whiteness*，之后依据这个思路就有很多类似的文献。这些后来的文献，比如 *Working Toward Whiteness* 会更细致地描摹美国的欧洲移民除了心理上觉得自己总是比黑人高一等外，是如何一步步将自己“美国白人化”的，包括如何通过加入排斥黑人、墨西哥人和亚洲人的工会试图让自己和本地白人劳工平起平坐，通过购买房产来和买不起房的黑人的区隔开来。另一方面，美国的各种移民法律，比如 1924 年的移民法案限制了很多国家的移民进入，导致北部需要更多的黑人劳工来代替之前移民的工作。这也使得美国社会，特别很多商家开始比较黑人和移民劳工的优劣，从而觉得“有些移民比别的移民和黑人更平等”。

游天龙老师在之前的讲座提过由于在正规就业市场被歧视，亚裔经常被雇佣来当白人罢工的工会打手。其实当时黑人被雇佣是更普遍的现象，因为黑人男性除了和亚裔一样工资很低外，也一直被认为更强壮暴力，同时身体更能忍受痛苦。20 世纪早期这些走投无路的工会打手都是由专业公司跨州雇佣、通过铁路统一运输的，所以雇佣的成本也进一步降低。另外，由于受到绝大部分工会的排斥，黑人劳工对白人工会存在怨恨，这也使得他们参与反罢工的时候带上了一些报复的心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1919 年席卷全美的钢铁行业大罢工中，绝大部分罢工打手都是黑人，而组织者一方 AFL 正巧拒绝黑人会员。所以最后这场罢工变成了资方雇佣的黑人和白人劳工的对战，非常有效地瓦解了劳工的团结。这场罢工之后整个钢铁行业劳工运动一蹶不振，15 年后才有新的罢工。

关于美国工会和种族主义的历史，还可以参考 Mike Davis 的经典作品 *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他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历史上工会的种族主义让美国劳工运动一直都比其他欧陆国家保守和官僚主义，这是所有左翼思想家都没有预料到的。美国工会的官僚化具体包括疏于培训草根运动家，排斥其他左翼组织，不愿意纳入女性主导的文书职位和有色人种占多数的南方农业工种，不与民权运动合作等。

一个例外是 1905 年在芝加哥成立的 IWW（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 一直是跨种族、性别和国界做动员的，这也是受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劳工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全世界劳工不分职业应当隶属于同一个工会，所以它们的信条叫“One Big Union”。但这绝对不是劳工运动的主流，IWW 哪怕在鼎盛时期也只有 15 万劳工会员，而同时期 AFL 旗下一个大行业分会，比如钢铁行业的人数都可以有 30 到 40 万。IWW 的组织现在还有，在一些中大型城市集会和罢工中还可以看到他们组织的身影。但 60 年代开始，IWW 开始直接介入民权运动，后来就更像一个社会运动组织而不是典型的工会。而且 IWW 是允许劳工隶属于别的工会的，所以其对旗下劳工的管理也更松散。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做过一个 IWW 的数据库，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和可视化，推荐给大家。

早期的美国共产党在族裔团结上构成了另一个特例。20 世纪早期美国共产党曾经积极动员过黑人激进派。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 1920 年前后有个黑人秘密会社叫做 African Blood Brotherhood, 是当时一个记者和出版人 Cyril Briggs 创办的(这个人也是加勒比的移民), Claude McKay 和 Harry Haywood 也是成员。这个组织内部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后来和美共有很多合作, 最终甚至直接成为了 CP 的一个分部。Harry Haywood 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他去苏联学习过, 见过包括胡志明在内的很多人。根据美共 30 年代初的组织宣传材料, 可以看到 TA 们有鲜明的种族立场, 支持南方黑人的自决, 和 RNA 立场接近。但很遗憾的是, 从 30 年代后期开始, 美共就已经逐步弱化对种族主义的讨论, 当时也以散布黑人分离和民族主义为理由驱赶了很多黑人激进派。直到 1959 年 CPUSA 正式放弃了美国黑人民族自决的口号。他们觉得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深化, 黑人白人自动会团结起来。那个时候民权运动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 美共不但没有有利介入黑人解放运动, 白人负责人反而开除了 Harry Haywood 等一系列黑人成员。基本上从这个节点开始, 美国的左翼激进主义运动, 至少从组织成员来看形成了种族分化的格局, 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美国主流的民权运动历史经常把 70 年代说得非常不堪, 好像除了尼克松为首的保守派开始反击外, 社会抗争全面停滞, 但这个完全不符合事实, 其实 70 年代中期美国的劳工运动才达到顶峰, 而这个高峰的到来和黑人解放运动密不可分。60 年代以后, 随着黑人权力运动的兴起, 黑人激进派就开始自立门户。1968 年底特律道奇工厂发育出来的劳工组织 the Dodge Revolutionary Union Movement (DRUM) 领导下工人罢工, 是民权运动以后第一次彻底关停了工厂的罢工。由 DRUM 发展起来的 the League of Revolutionary Black Workers 是 70 年代最重要的黑人激进组织, 卷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罢工, 也动员了很多白人劳工。但从组织层面, 出于对白人的绝望, 这些组织都只允许有色人种加入。The League 也是最早提出并为 reparations 募集到款项的组织, 动员白人宗教组织拿到了至少 20 万美金的捐款, 所以不该预设所有白人都本能排斥黑人权力运动的理念。到 80 年代纽约还成立了 The National Black United Front, 到现在这个组织还比较活跃。90 年代末 Black Radical Congress 在芝加哥成立, 曾经聚集起了很多黑人运动家、泛非主义者和学者, 包括 Angela Davis, 这些人也试图和其他族裔的激进派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所以其实 60 年代末民权运动消退以后, 黑人运动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关键问题是当黑人发展自己的运动组织后, 因为社运历史的记录者往往是白人, 所以这些努力就不太容易被人看见。Michael Dawson 在 *Blacks in and out of the Left* 里就很详细解释了黑人如何和白人左翼思潮渐行渐远, 白人新左派也一直都不愿意承认黑人权力运动对族裔解放的作用, 然后久而久之黑人激进派就被边缘化了。

总结一下, 一系列原因共同导致了美国的种族和阶级撕裂了激进主义运动。首先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遗产导致很多左翼认为阶级斗争优先, 种族只是阶级的反映。很多左翼组织内部也无人去读杜博依斯、法农等黑人思想家的作品。从美共的历史也可以看到核心组织在分化中逐步远离黑人运动。再者, 黑人激进派遭受到普遍的国家暴力, 被迫转入地下。战后兴起的郊区化和居住隔离也很可能对左翼政治不利, 因为左翼是非常依赖面对面社区动员的, 但居住隔离导致左翼动员不到底层黑人, 也难以建立跨族裔联盟。这些因素带来白人黑人互不信任的长期影响, 不同族裔建立单独的激进左翼组织, 这也导致黑人激进派愈发被孤立, 在主流政治里处于边缘的地位。

所以如今至少从选票的层面, 自由主义的思潮基本上主导了美国的黑人政治, 奥巴马之年也一度巩固了很多人的幻觉, 目前为止黑人对民主党的依附性还是很强。同时因为长期的打压, 黑人激进派一直处于相对边缘和半地下的状态, 一般没法像白人组织一样会公开招募成员, 很多社区也没有登记为社会组织。但是另一方面, 近些年 BLM 运动让黑人运动有重新激进化的可能性, 参与运动的黑人运动家一般都不会在两党政治的框架下思考种族解放, 核心运动家绝大部分都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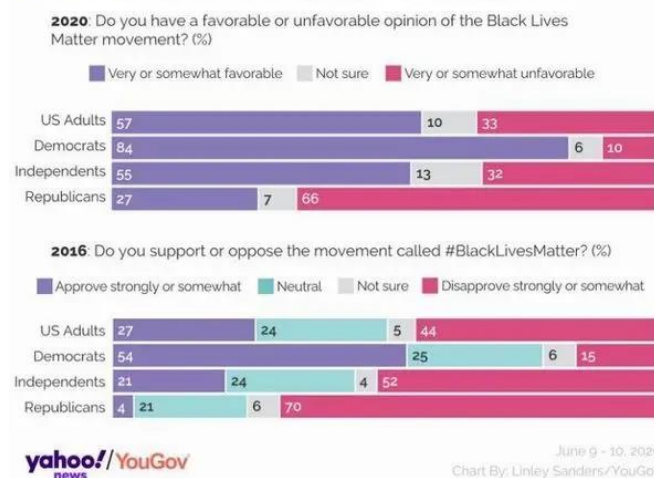
其他左翼、劳工和 LGBTQ 组织任职。比如提出 BLM 口号的三位黑人女性 Alicia Garza, Opal Tometi 和 Patrice Cullors 都同时活跃在各类劳工和移民运动中，她们也在不同场合强调 BLM 是跨越国界的。

目前，美国当代左翼组织的事实性种族隔离还是非常严重。很多大众也已经有了左派都是白人的刻板印象，而不愿意多和他们来往。这里列举四个比较主要，立场又不太一样的白人左翼组织。说它们是白人组织不是说这些组织就没有有色人种成员，而是非白人的比例非常低，组织内部有色人种成员也往往经历明显的歧视。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是目前全美最大的左翼组织，有七万多付费会员。它曾经是相对保守的组织，是借着 80 年代很多更激进组织解体时候趁乱成立的。它的种族主义问题也很久了，80 年代的时候 DSA 没有支持民主党激进派黑人候选人 Jesse Jackson 的总统竞选，史学家一般认为是组织内部种族主义导致。这两年随着组织内部有更多新的成员，有一些分部有了更多内部种族主义的反思。Socialist Alternative (SA) 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它在美国的知名度基本是靠当选西雅图市议员的 Kshama Sawant 提升的，目前 Sawant 还在市议会任职，也积极支持参与了当地的占领运动。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 (PSL)基本是个白人斯大林主义组织，经常持比较教条的立场，但他们对拉美政治的关注可能是所有组织里最强的。Redneck Revolt (RR)是个很有意思的左翼拥枪组织。所以这也有助于打破白人拥枪的都是红州保守主义者的刻板印象。

当前以黑人为主的左翼组织内部意识形态也很多元。Black Socialists in America (BSA)是 2018 年才成立的黑人社会主义组织，很大程度是为了回应 DSA 的种族问题，当然相比 DSA，BSA 的公开活动要少很多，成员都是匿名出境。Revolutionary Abolitionist Movement (RAM)是无政府主义的社区，它们也有仿照黑豹党的十点纲领，包括废除警察军队和监狱。所以现在 Defund the Police 运动中确实是有希望彻底废除警察的一派的，也没必要否认和切割。Cooperation Jackson 是一个 2014 年密西西比杰克逊成立的合作社网络。Huey P Newton Gun Club 顾名思义是以黑豹党前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拥枪组织。总的来说在美国的左翼政治版图里，黑人左翼会更偏无政府主义一些。因为一来在践行民主集中制的混合族裔组织里，黑人肯定是被压迫的；二来无政府主义组织更去中心化，可以更有效地规避国家的监视和镇压。

黑人解放运动与 BLM2020

Yahoo News/YouGov: In 2020, most Americans have a favorable view of the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



党派与 BLM 支持，来源于：

<https://news.yahoo.com/new-yahoo-news-you-gov-poll-support-for-black-lives-matter-doubles-as-most-americans-reject>

最后谈一下对目前“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 BLM）的一些观察，以及和之前提到的黑人运动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黑命攸关”虽然由反警察暴力开始，但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议题。虽然在中文网络上可能还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在美国本土，黑命攸关从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了大部分人口的支持。

从民意调查上来看，Black Lives Matter 的口号在 2012 年奥巴马任下刚提出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这和历史上所有黑人运动，甚至社会运动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公众对社会运动的高支持度，往往是参与者不断动员、说服、制造领导权的结果。对比 2016 年和今年的数据，可以看到 2016 年的时候，YouGov 调研的美国被访者只有 27% 明确支持运动，这个比例到今年翻了一倍不止。当然这里有个问题是今年没有中立这个选项了，所以很多人态度可能向支持方向位移，但明确反对运动的人也减少了不少。然后很有意思的是，中间派独立选民的意见变化幅度是最大的，也就是说其实运动动员起来了大部分中间选民，但基本没有让共和党选民改变看法。

从皮尤归纳的分族裔的支持度来看，除了各族裔总体更支持黑命攸关外，拉丁裔的观念变化是最剧烈的，直接从 2016 年的比白人更不支持，到目前 77% 的高支持度。总体感觉是这次全国范围的 BLM 通过把黑人的处境置于其他少数族裔和移民面前，从而极大促进了少数族裔之间的自我教育和团结。这里没有亚裔的对比数据，但之前有个单独的调查发现抗议下亚裔对警察的观感下降是最明显的。最近针对亚裔为何不支持黑人运动有很多辩论，但其实对拉丁裔来说，除了无证移民，很多人同样很难共情黑人的处境。这次抗议期间拉丁裔内部，特别是白人拉丁裔同样有反省自身的 anti-Blackness，甚至也有如何和父母和老一辈有效对话这种讨论。所以其实亚裔也可以通过和拉丁裔的连结，来互相指认和创造性地面对社群内部种族主义的问题。

Most Americans express support for the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

% saying they _____ the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

	Strongly support	Somewhat support	Net
All adults	38	29	67
White	31	30	60
Black	71	15	86
Hispanic	42	35	77
Asian*	39	36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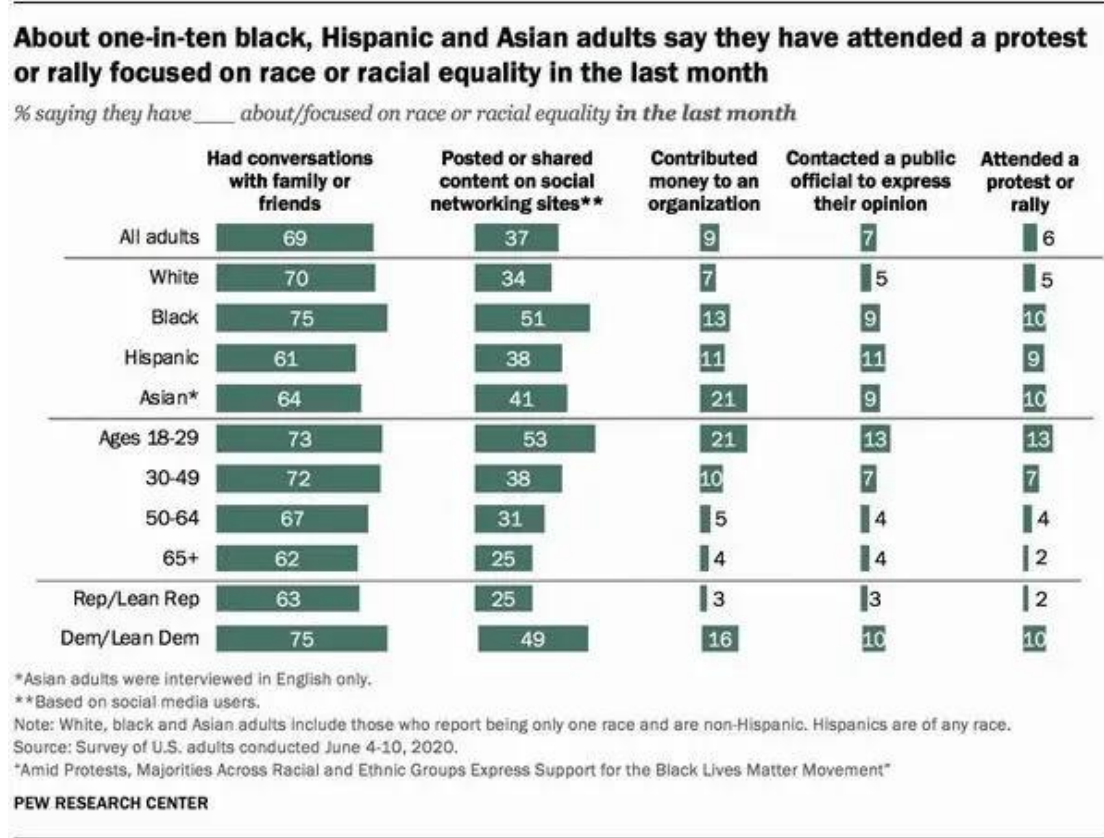
*Asian adults were interviewed in English only.
Note: Figures may not add to subtotals due to rounding. White, black and Asian adults include those who report being only one race and are non-Hispanic. Hispanics are of any race.
Source: Survey of U.S. adults conducted June 4-10, 2020.
"Amid Protests, Majorities Across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Express Support for the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

PEW RESEARCH CENTER

2016 年 BLM 分族裔支持度，来源于：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7/08/how-americans-view-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

最后这张图表是皮尤同一个调查里不同人口变量与政治参与行为的交互，可以看到拉丁裔、亚裔的参与比例和黑人十分接近。甚至在给组织捐款上，亚裔的比例要远远超过其他族裔。按照右图给出的过去一个月的抗议参与比例，也是只有白人在拖后腿，且亚裔的参与度是所有族裔中最高的。我们觉得亚裔参与度低还是因为亚裔总人数真的太少了，很难在抗议中彼此看见。当然这类调查经常只访问会说英语的亚裔，所以实际比例会低一些，但至少说明年轻一代的政治参与热情是非常高的。



Pew 不同人口变量与 BLM 政治参与行为的交互，来源于：

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20/06/12/amid-protests-majorities-across-racial-and-ethnic-groups-express-support-for-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psdt_06-12-20_protests-00-10/

BLM 运动跨种族的高支持度伴随的是其去中心化的特征。在我看来去中心化具体是和三个子特征结合起来的，商业化、城市社区化和大规模监控。但凡社会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商业化的色彩，或者说更多企业看到民意愿意去支持 BLM 的诉求。早期可能是耐克这样的运动企业会支持，因为顾客里就有很多黑人，但现在亚马逊、Spotify、Netflix 这类互联网公司也加入了挺 BLM 的阵线。讽刺的是，亚马逊恰恰是造成黑人持续贫困和被压迫的根本原因。它造成的士绅化，对旗下服务业劳工的压榨、Covid19 下对仓储和 WholeFoods 罢工的镇压都很能说明它支持 BLM 的虚伪性。亚马逊 2018 年的时候还被爆出将旗下一个面部识别软件 Rekognition 卖给警方。在这样的背景下，BLM 运动内部肯定会有策略性支持商业公司的，也有反对被资本主义收编的激进派。这种运动内部的立场如何在一个去中心的结构下做协调配合，而不是拉锯内耗，对未来的运动是一个挑战。

这次各地上街的人数很多，口号也很齐整统一，但每个地方的运动势能和诉求差异其实很大。因为像 Defund the Police 这种诉求落实肯定是要运动参与者和当地的市长、市议会、警察部门斗

争和斡旋。警局的预算一般都是市议会批准的，比如前两天白思豪批准市议会砍掉了 NYPD 下一个财年 7% 的预算。还有拆种族主义雕像和壁画的话各地的情况也非常不同，还有一些历史雕像可能在其他少数族裔社区和大学，还需要抗议者和社区负责人、各类社会机构进行协调。

另一个去中心的因素，则在于不同城市社会运动的历史遗产不同，我这里举西雅图和我居住的费城的例子。这次西雅图抗议最特殊的地方就是 CHAZ/CHOP 占领区。这个区域几天前已经被清空了，但还是留下不少宝贵的运动经验和教训。之所以西雅图可以成功实现占领而非简单的游行，和本地有几十年历史的占领文化和无政府主义社区的兴盛是很有关系的。最晚从 70 年代开始原住民和拉丁裔社群就组织过不少占领荒地和学校的行动。CHOP 占领区有各个不同社运组织的力量，除了 BLM 的人外也有大量当年参与 Occupy 的社群，还有一些这次疫情下涌现出的互助组织。因为 Occupy 的白人占大多数，所以运动内部一直都有种族和运动路线的矛盾，比如自治和占领的议程是否会干扰更紧迫的警察改革，这些争议直到占领结束也没有缓解。但总的来说，西雅图之前各个族裔联合抗争的历史对这次的运动有非常大的帮助。

相比之下费城的政治生态就非常不同。这里有非常强的黑人权力运动的历史，美国第一个黑人权力运动组织 RAM 当年总部就是在费城，其他黑人权力组织在费城也都有分部，当然还有 MOVE。今次 BLM 运动里，西费城的行动者纪念 MOVE 爆炸三十五周年还特别制作了短片，可以看到现在费城的社运还是受到当年历史很强的影响，诉求要比其他地方激进很多，比如这里的运动家是反对“Hands up, don't shoot”这种自我矮化的口号。虽然很多这类抗议吸引不了全国媒体的关注，但是对本地政治是有很大影响的。

最后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应对大规模监控。美国的黑人运动受到的国家监控是最严密的。这次各地的 BLM 示威，各城市和州警察、国民警卫队、FBI 和军方都派出了无人侦察机和巡逻机，监控达到了军事级别。仅仅国土安全部和海关执法局就直播和录制了至少 270 小时的抗议人群画面，这还不包括其他地方部门的档案。面对这种监控，我认为美国运动者做得还是很不够，很多消息发布和沟通都靠公开的脸书、推特和 Instagram，反而是 Boogaloo 等右翼运动更多用加密软件。目前电报上最大的 BLM 频道只有不到一万关注者，完全不成体系，这可能对未来的运动协调造成伤害。

参考读物：

- Bothmer, Bernard von. 2010. *Framing the Sixties: The Use and Abuse of a Decade from Ronald Reagan to George W. Bush*. First editio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Brown, Elaine. 1993. *A Taste of Power: A Black Woman's Story*. 1st Anchor Books edition. New York, NY: Anchor.
- Davenport, Christian. 2014. *How Social Movements Die: Repression and Demobil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New Af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Angela Y. 2016. *Freedom Is a Constant Struggle: Ferguson, Palestine,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 Movement*. 4TH PRINTING edition, edited by F. Barat. Chicago, Illinois: Haymarket Books.
- Davis, Mike. 1999. *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he History of the US Working Class*. Verso.
- Dawson, Michael C. 2013. *Blacks In and Out of the Lef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u Bois, W. E. Burghardt. 1998.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860-1880*. 12.2.1997 edition.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Elbaum, Max. 2018. *Revolution in the Air: Sixties Radicals Turn to Lenin, Mao and Che*. New edition. London: Verso.
- Haider, Asad. 2018. *Mistaken Identity: Race and Class in the Age of Trump*. London: Brooklyn, NY:

- Verso.
- Hoerl, Kristen. 2018. *The Bad Sixties: Hollywood Memories of the Counterculture, Antiwar, and Black Power Movements*.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 James, C. L. R. 1989.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2 edition. New York: Vintage.
- James, Winston. 1999. *Holding Aloft the Banner of Ethiopia: Caribbean Radicalism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Reprint,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Leonard, Aaron J., and Conor A. Gallagher. 2018. *A Threat of the First Magnitude: FBI Counterintelligence & Infiltration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to the Revolutionary Union - 1962-1974*. London: Repeater.
- McAdam, Doug. 1990. *Freedom Summer*. 1st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khtefi, Elaine. 2018. *Algiers, Third World Capital: Freedom Fighters, Revolutionaries, Black Panthers*. Verso.
- Robnett, Belinda. 1997. *How Long? How Long?: African American Women in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1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ediger, David R. 2005. *Working Toward Whiteness: How America's Immigrants Became White: The Strange Journey from Ellis Island to the Suburbs*. New York: Basic Books.
- Spencer, Robyn C. 2016. *The Revolution Has Come: Black Power, Gender, and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in Oakland*. Reprint edi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 Theoharis, Jeanne. 2018. *A More Beautiful and Terrible History: The Uses and Misuses of Civil Rights History*. Boston: Beacon Press.
- Ture, Kwame, and Charles V. Hamilton. 1992. *Black Power: The Politics of Liberation*. New York: Vintage.
- Wallace, Michele. 2015. *Black Macho and the Myth of the Superwoman*. Reprint edition. London: Verso.
- Whatley, Warren C. 1993. "African-American Strikebreaking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New Deal."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7(4): 525–58.

【网络文章】

黑人大法官为什么反对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美国华裔联盟（CAA）

<https://mp.weixin.qq.com/s/45bATIN7k8c7GgUQQm95TA>（2020-6-28）

最近美国社会为黑人 George Floyd 的惨死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抗议游行活动，与此同时一些与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相关的提案也正在浮现，比如加州的立法机构正在讨论的 ACA5 要在大学录取中采用按照种族配额的制度，极有可能伤害华人的利益。本文探讨了美国最有权力的黑人-托马斯大法官反对平权法案的理由，希望从法律角度为各位希望制止平权法案对华人利益伤害的朋友提供理论支持。本文作者是在美国大律所工作的小律师。

托马斯大法官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唯一的黑人，可以说是美国最有权力的黑人，但他同时却是最高法院中对平权法案最坚定的反对者，反对政府以任何形式基于种族来优待某一类人，包括黑人。他身为黑人为什么反对优待黑人，理由又是什么呢？

什么是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在进入正式讨论之前，我们先要确定 Affirmative Action（为阅读方便，本文用中文“平权法案”代指）这个词的意思。

平权法案最早出现在肯尼迪总统 1961 年签署的行政命令中，本来是一个消极意义的概念，是禁止政府在招聘和执行中有根据种族与信仰等的歧视行为，但是在今天演变成了一个积极意义的概念，指那些给予历史上受到歧视的种族在教育、就业、住房事务上以优待的政策。举教育上的例子来说，平权法案会导致黑人的小孩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条件下比其他族裔的小孩都更容易入读公立学校。

托马斯大法官为什么反对平权法案

托马斯大法官对平权法案的反对要从他自己的经历说起。身为成长在有平权法案年代的黑人，他在找工作的时候也被雇主质疑自己能力到底有没有成绩单上显示的那么好，因为担心他是靠平权法案读的耶鲁法学院。

而他后来读的 Race and Economics（种族与经济）一书则奠定了他在种族领域思想的基础。在那本书中，作者 Thomas Sowell 指出简单地把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和他的肤色划上关系是很不严谨的，会忽视掉个体差异的复杂性。

“那么多人误解那么多问题的原因是那些问题都很复杂，但是那些人不要一些无法让他们情感上得到满足的来自事实或者分析的解读。他们想要的是可以憎恨的恶棍和值得欢呼的英雄，而这些是解读给不了他们的。”——Thomas Sowell

我们可以用肤色去概括一个人吗

平权法案的一个基本假设是黑人的经济状况由于历史原因比其他族裔要差，所以要在政策上给予优待，弥补历史上对于黑人的剥削。

但是，按照 Thomas Sowell 的逻辑，个体经济状况的复杂性很难被肤色给概括。举例来说，在美国医生往往收入不菲，这个群体里黑人和白人的经济状况差不多；而餐厅服务员不管肤色往往收入很低。一名黑人医生和黑人服务员经济上的差别可能远大于黑人医生和白人医生的收入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给黑人以优待，对于那些端盘子的白人也是很不公平的。

基于上述理由，托马斯大法官在分析时喜欢采用分析具体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整体，认为平权法案没有认识到自己要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过度简化了问题，所以作为解决方案也是有问题的。

这里引申了说一下，其实平权法案背后是美国社会收入的不平等，那么也许通过增加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帮助，而不是增加对某种肤色的人的帮助，更加有针对性。

平权法案为什么违反了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在法律上，托马斯大法官对平权法案最主要的反对基于联邦宪法中第十四修正案中的 Equal Protection Clause（法律平等保护条款）：没有任何政府可以在它的辖区内不给任何人提供法律的平等保护（“.....nor shall any State.....deny to any person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

“在美国法律传统中，自由一向被认为是个人能免受政府的干扰，而不是个人有权享受一种特殊的政府福利。”——Thomas Sowell

在托马斯大法官看来，Equal Protection Clause 禁止政府基于种族给予优惠待遇。举例来说，在 Adarand Constructors v. Peña 中，托马斯大法官写道：“.....政府不能让我们平等，它只能承

认、尊重并确保我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权法案可能出发点很好，但是不能违背宪法不能根据种族对人群作区分的原则。”（“……Government cannot make us equal; it can only recognize, respect, and protect us as equal before the law. That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 may have been motivated, in part, by good intentions cannot provide refuge from the principle that under our Constitution, the government may not make distinctions on the basis of race.”）在 Gratz v. Bollinger 中，托马斯大法官写道：“政府在高等教育上采用种族歧视的方法是被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明确禁止的”（“a State's use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dmissions is categorically prohibited by 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在托马斯大法官看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平权法案的实施，就像《动物农场》里说的一样，会导致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加平等。

现今美国为什么华人有机会在法律上成功反对平权法案

抛开政治层面的话题不谈，在今天的美国，不论是地方或者联邦如果推行了平权法案，损害了华人的利益，华人都是有机会成功在法律上反对平权法案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联邦最高法院里有 5 票是会反对平权法案的。

美国的法律虽然细如牛毛，但是具体解读起来还是有很多灰色地带，而这些疑难问题最终是由联邦最高法院中的多数票来决定的。多数票不一定需要 5 票，比如说有三种不同的法律意见，人数分别是 4 人、2 人、3 人，那么有 4 个人的法律意见就会成为最高法院的意见。考虑到最高法院大法官总共才 9 人，如果能有其中 5 人在某个解读上达成了一致，那么这种解读就肯定能成为最高法院的意见。所以说，有句开玩笑的话说，**美国的法律其实是由最高法院的 5 票来决定的。**

最高法院关于平权法案最新的案子是 2016 年的 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虽然这个案子中最高法院判平权法案不违宪，但是最高法院中保守与自由派大法官的组成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今天来判的话估计是不一样的结果。

在 Fisher 案中，原告认为德州大学考虑定录取情况的政策是违反了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的，但是当时的最高法院判德州大学的录取政策并没有违宪。当时最高法院的意见是 4 名大法官支持的：肯尼迪大法官(Justice Kennedy)、金斯伯格大法官(Justice Ginsburg)、布莱尔大法官(Justice Breyer)、索托马约尔大法官(Justice Sotomayor)。反对的大法官有三名：托马斯大法官、罗伯兹大法官(Justice Roberts)、阿利托大法官(Justice Alito)。

现在支持平权法案的肯尼迪大法官退休了，特朗普新任命的戈萨奇大法官(Justice Gorsuch)和卡瓦诺大法官(Justice Kavanaugh)都是会反对平权法案的，而原来反对平权法案的三位大法官仍然在位，所以就有了 5 票。

也许你会问，联邦最高法院和州法律有什么关系呢？比方说，加州如果通过了 ACA5，那么联邦的最高法院也管得着吗？还真的管的着，根据 Supreme Clause（至高条款）和 Federal Preemption Doctrine（联邦专有权原则），州法律不能和联邦法律相违背，最高法院的判决也是法律，地方不能违背。

托马斯大法官认为美国黑人的出路在哪里？

读到这里，也许你会认为托马斯大法官是黑人的叛徒，不在政策法规上帮黑人争取利益。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并不是。托马斯大法官并没有否认美国的黑人相对于其他族裔在整体上处于一个比较劣势的地位，他只是不认为平权法案能解决这个问题。相反，根据他的传记《托马斯的污点》（The Enigma of Clarence Thomas）的作者的说话，**他认为平权法案对黑人群体有害。**

在托马斯大法官看来，平权法案只会让黑人整体一直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因为有平权法案的存在，黑人可以不需要达成其他族裔一样的成果就能得到和其他族裔一样的收获，这就让**黑人群体非常依赖这个平权法案而失去了提升自己的动力**，到头来只能一直仰仗白人的施舍，自己无法靠自己站起来。

那么黑人的出路在哪里呢？托马斯大法官认为是通过黑人的自立而不是政府的政策倾斜。

【报刊文章】

摧毁黑人家庭的，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福利“甜毒”

《南方周末》2020-07-01

和黑人相关的所有社会问题都可以被装进“种族歧视”“奴隶制创伤”之类的大箩筐里，以至于涉及任何种族议题时，政治家和媒体都化身高中历史老师，煞有介事地谈论着一两百年前的陈年往事，反而是近五十年来公共政策很少被审视和讨论。

这似乎是理所应当的，《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选举权利法案》摧毁了种族隔离之后，美国政府推行了大量向黑人倾斜的福利制政策。对这些善意满满、投入大量政府资源的“德政”，唯一被舆论容许的批评就是“做得还不够”。然而，正如过高的糖分摄入导致疾病，福利制的“甜毒”正在摧毁底层黑人。

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无疑是底层少数族裔的家庭结构。2015年美国本土77%的黑人婴儿出生于单亲妈妈家庭，黑人族裔的家庭结构已经分崩离析。

毫无疑问，奴隶制造成了很多罪恶，但是并不包括破坏黑人家庭结构。因为庄园主出于减少反抗、维护秩序的目的，倾向于维护并巩固奴隶家庭的稳定，而黑奴珍视家庭组织对生存环境的支持。因此，南方种植园中，黑奴大家庭是普遍存在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奴隶交易是以整个家庭为单位。即使单独被交易的奴隶，也大多到了可以正常离开家庭的年龄。

在种族隔离时期，黑人群体总体上继承了过去的家庭观念，甚至比二十世纪一代又一代离经叛道的白人青年更为保守。“黑人老祖母”和“犹太祖母”一样，都是大家庭紧密联系的象征。严父慈母、父慈子孝在很长时期内都是家庭伦理的核心。即便是少女单亲母亲，也怀抱着健康积极的未来憧憬，直到六十年代平权运动后，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1960年代末，黑人社会学家乔伊斯·拉德纳到圣路易斯的黑人贫民窟访问了一批十几岁的母亲。她后来的成名作《明天的明天》就是基于这些访问写成的。在书里，她描述了这些已经为人之母的少女为子女设计的梦想：她们希望孩子长大之后能够好好读书，找到稳定的工作，或者是经商从政。从而得出结论说，黑人与白人的梦想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二十年之后，她再次回到同一个社区，重访少女母亲们。结果令她大吃一惊。拉德纳发现，在种族平权运动过去了一代人之后，少女母亲们的梦想变了——她们中许多人觉得，孩子长大以后，和自己一样不工作、吃社会福利并没有什么不好。拉德纳哀叹道，平权运动与国家福利看来还是有许多负面效果的。

遗憾的是，拉德纳的哀叹并没有引起重视。福利制度还在不断出台，到奥巴马时代达到了高潮，老祖母的黑人家庭挺过了奴隶制、挺过了种族隔离，却在浓稠的福利糖浆中溶解得无影无踪。

由于多年来层累叠加的福利政策，没人能够对单身母亲福利做出准确的计算。根据BBC的估算，这些林林总总福利收入大体是美国平均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照此计算一位无业单亲母亲在2019年可以获得22500美元。按照美国贫困人口标准，四口人的贫困家庭税前的年现金收入

大致与此相当，而两口之家的贫困标准为税前年度收入 14000 美元左右。显然无业的单身母亲靠福利收入，日子过得比很多贫困家庭更滋润。无业单身母亲的福利主要由下列项目构成：

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补助营养援助计划（SNAP）和失业补助金（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大体可以提供每月一千美元左右的现金收入。其中 TANF 尤为值得一提，其前身 AFDC 无条件提供给任何贫困单亲无业家庭。1996 年 TANF 取而代之，限定了“正在工作、正在寻找工作或接受工作培训”的条件，并且设最高受益年限。然而，实际执行中有很多方式规避各项条件限制，并没有起到促进就业的作用。全美 TANF 平均为每月 418 美元，而 SNAP 为每月 318 美元，再加失业补助金，合计约为每月 1000 美元左右。像加州这样的“福利天堂”，每月可以达到 1500 美元。

类似的按月计算发放的现金补助还有母婴儿童为对象的生育补助 WIC，其中的现金部分为每人每月 40 美元。

还有按年度计算的现金补助如每年 200 到 1000 美元的能源补助、最高可达实际支付房租 70% 的房租补助等等。

除了现金方式的补助，很多福利项目不是以现金形式发放，所以不能直接计算金额。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奥巴马医保改革增加了免费的联邦医疗保险，以及 WIC 等项目还提供了很多内容庞杂的免费公共服务。

这些还不是全部，一些看上去和单身母亲没有直接关系的福利项目，也可以通过“操作”获得。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对贫困大学生的福利资助。大量享受政府补贴的社区大学几乎不设门槛，年度费用在 1500 美元以下，非常亲民。低成本获取“贫困大学生”资质后，就可以申请相应的福利补贴，在一些“福利州”最高可能达到每年 6000 美元。

因此，单身母亲的实际福利收入可能比 BBC 的估算更高。考虑到早早生娃的黑人单身母亲大都缺乏教育基础和职业技能，按照美国各州平均每小时 10 美元左右的最低工资标准收入，她们就业的税前年收入仅为 16000-18000 美元，“吃福利”每年获得两三万美元的待遇明显优于辛苦工作。

这种“优厚待遇”之下，黑人群体的工作意愿还能有多高呢？既然单身母亲们的经济需求可以依赖福利系统，那么只管生不管养的男性也不必辛苦承担丈夫、父亲的责任。对感情关系厌倦之后，“出去买包烟就消失了”，切换成街头“悠闲度日模式”。没有长期目标和家庭责任的得过且过，黑人男性的犯罪率畸高并不意外。而他们的后代，父亲缺席的孩子，缺乏对社会秩序的敬畏，没有健全的伦理观念和家庭责任感，大概率延续父亲的足迹，开启新的循环。

黑人的这些问题不是因为他们的肤色，也不是他们的种族，而是作为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更容易受到福利制度的致命诱惑。至于奴隶制之类的历史问题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强化黑人群体“历史受害者”的政治自觉，驱使他们凝聚在政客们的身边。政客们分发更多的福利，黑人繁衍更多的铁票。至于福利制的长期副作用，政客们并不关心——奥巴马医保制度分发给单身母亲的医疗保险大单，代价是消灭大量全日制的低端工作，伤害无疑集中在更多从事低端工作的少数族裔。但是，这种伤害是曲折隐蔽的，可以由雇主背锅，而补贴的“蜜糖”就在眼前……

乔伊斯·拉德纳在 1980 年代看到了福利制“甜毒”发作的开头，看到了“和白人一样的梦想”是如何消逝的，看到了平权运动带来的政治地位改善被滥用。三十多年后，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黑人）看到了“甜毒”发作的晚期，溃烂的社区、崩溃的家庭、失去自立能力的失败者群体，以及更为深刻的种族隔阂。种族问题？一言以蔽之，种族问题的表象之下是政治问题，不是福利制度“做得还不够”，而是“做得太多”了。

【论 文】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313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